

编号	6792
	84.2
军政大学政治资料室	

10

# 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史

## 学习材料

下册

(党史短训班学习用书请勿外传)



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

一九七五年十月

#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 说 明

为了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内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史的需要，我们编选了这套学习材料。本书是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分专题编辑起来的。

毛主席著作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历史的基本教材。我们编辑这套学习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怎样战胜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由于大家都有《毛泽东选集》，凡选自《毛泽东选集》的著作，我们只列目录，不印内容。

本着以自学为主的原则，我们编选了一部分党的历史文件和有关文章，供同志们自学时参考。同时，为了增强我们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我们还附录一些反面材料，供大家批判。

由于我们的路线觉悟和理论水平不高，本书的编辑工作难免有很多缺点和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

一九七五年十月

# 目 录

## 第八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 高岗、饶漱石右倾机会 主义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著作：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六月）……………（ 3 ）

参考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四次  
全体会议的公报（摘录）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 6 ）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  
反党联盟的决议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11 ）

## 第九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 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的斗争

毛主席著作：

##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六月)

### 参考文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  
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摘要)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 ( 20 )

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摘录)

(一九六七年七月) ……《红旗》杂志社论 ( 26 )

### 附录:

意见书 (摘录)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彭德怀 ( 32 )

# 第十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 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 路线的斗争

### 毛主席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关于重庆谈判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同上书)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同上书)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同上书)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见《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同上书)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92)

**参考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

**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93)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政治报告(摘录)**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100)

**附录:**

**时局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刘少奇(135)

**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少奇(162)

**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165)

# 第十一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 路线的斗争

## 毛主席著作：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同上书第四卷，第一一四三——

一一四五页为精读部分）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月）

（同上书）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同上书）

## 参考文件：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188）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

……………《人民日报》社论（205）



**“林氏春秋”的破产**

——评林彪一伙炮制的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 .....

.....军政大学大批判组 (209)

## 第 八 讲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 高岗、饶漱石右倾机会 主义路线的斗争

## 毛 主 席 语 录

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载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第四九四页

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

《关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汇报》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四期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转引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著作：

##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六月）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并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困难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同意。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象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

什么都不行，好象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选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参考文件：

##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公报（摘录）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一致通过了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一九五四年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党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并根据他的建议起草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提交七届四中全会讨论。

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内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中国共产党依靠全党的团结，领导着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现在中国的革命事业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国内人民的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在国外还存在着帝国主义的包围。现在中国正处

在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我们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比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也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党内产生过陈独秀、张国焘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如果敌人真能造成一种派别的话）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所以全党千万不要以为力求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者和坚决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要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寻找代理人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不是的，如果敌人不想分裂我们，不想利用我们队伍里面的分歧，不想利用我们队伍里面的不忠实、不稳定以至别有用心的分子



作为代理人,那才是真正奇怪的事。因此我们的任务决不是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除全党的警惕性,而应当是相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性,使全党处于清醒状态,并且用增强党的团结的实际行动来答复敌人的阴谋。

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我们党的内部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基础上,经过种种牺牲奋斗,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全党的团结一致,这个团结又由于及时地正确地克服了危害党的团结的敌对活动和错误倾向而日益巩固,终于使党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但是,我们党现在还采取着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策,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我们的党很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还很不够,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同时,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特别是由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当此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要历史关头,有极大的必要来唤起全党同志更加提高

革命警惕性，更加增强党的团结。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决议要求全党的同志都以高度的自觉来爱护党的团结，为增强党的团结而努力。特别是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对于党的团结的必要和自身责任的重大都应有很高的自觉，并应在党内作很大的努力和必要的工作。

为此目的，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规定了各项增强党的团结的具体办法，同时又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不但不允许缩小党内民主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竭力避免一切可能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事业得到顺利的进展。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进行批评，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但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

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具体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

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最后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以及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在增强党的团结的事业上，这些负责同志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决议号召这些同志并经过这些同志教育全党干部以身作则，同心同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以便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为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破坏阴谋，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选自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了中央委员会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

高岗的反党活动已经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根据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从一九四九年起，高岗就以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他在东北和其他地方制造和散布很多污蔑党中央和吹嘘自己的谣言，在同志中挑拨离间，煽动对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且在这种活动中形成自己的反党宗派。高岗的反党宗派在东北地区的工作中违反党中央的政策，竭力降低党的作用，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把东北地区当成为高岗的独立王国。高岗在一九五三年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的反党活动更为猖獗。他甚至企图煽动在军队中工作的党员支持他反对党中央的阴谋，并为此而鼓吹一种极端荒谬的“理论”，说我们的党分为两个：一个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另一个是所谓“白区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他自认为是所谓“根据地和军队的

党”的代表人，并自认为应当掌握主要的权力，因此党中央和政府都应当按照他的计划改组，他自己在现时应当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担任国务院总理。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向反党分子提出严重警告以后，高岗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的背叛。

饶漱石是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现在已经完全查明：饶漱石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五三年的十年间曾多次为了夺取权力而在党内使用可耻的欺骗手段。他在华东工作期间，在城市和农村中竭力采取向资本家、地主、富农投降的右倾政策，并违抗中央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而竭力保护反革命分子。一九五三年他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认为高岗夺取中央权力的活动将要成功，因此同高岗形成反党的联盟，利用他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发动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为目的的斗争，积极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到现在，饶漱石从无悔改之意，并且仍然继续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以及这一活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五三年达到顶点的事实，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的。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活动是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化和深刻化的反映。在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首先是帝国主义的极大的仇视；美帝国主义正在继续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并积极利用台湾和其他军事基地对我国进行颠覆活动和准备侵略战争。在另一方面，国内的反革命残余分子和资产阶级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分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也正在加

紧他们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但是我们的敌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劳动人民中间享有无限的威信，是我们国家的领导力量，只要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地坚持着社会主义事业，敌人的任何进攻就必然遭到彻底的失败。因此敌人就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党，并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分裂和蜕化上面。这是任何一个具有革命政治常识的共产党员和党外爱国分子都能认识的真理。高岗、饶漱石等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面结成了反党联盟，向党的中央委员会首先是中央政治局举行进攻，企图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久经考验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以便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他们的这种反党活动无疑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愿望。他们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换自己的手法。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中央政治局对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满意地指出：在党中央揭露和制止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并把这一事实连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向全国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以后，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是进一步巩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已经被彻底粉碎。这是党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和党的整个发展历史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一。

但是同时必须指出：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及时地揭露和粉碎阶级异己分子腐蚀党和分裂党的活动，这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只要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阶级的敌人总是会设法影响我们党内的不坚定的和不可靠的分子，而我们党内也总会有不坚定的和不可靠的分子受他们的影响。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相类似的事件今后还可能出现。因此，坚持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反对任何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的言论行动的各项规定，不但是目前一个时期的任务，而且是全党长时期的任务。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有力地证明了党必须坚决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决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各级党组织必须继续同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倾向和分散主义倾向作斗争，同压制党内民主、压制批评的现象作斗争，同骄傲自满情绪和个人崇拜习气作斗争。一切这些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倾向必然会导致党员的堕落和蜕化，并成为阴谋分子得以利用的空隙，因此党决不能容许这些恶劣倾向在党的任何角落存在。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又一次证明了党对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任何工作人员都必须实行严格的、经常的、有系统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这种监督可以

帮助党员及时地发现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而没有这种监督，一个好的党员也可能犯严重的错误以至变坏。为此，党的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应当迅速地建立或健全各种检查和巡视制度，把管理干部和检查干部的实际工作情况的任务统一起来。为此，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应即成立监察委员会，代替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便更有力地对于党员中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行为作经常的坚决的斗争。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说明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意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政治手段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阶级敌人腐化革命队伍的危险武器，放松对于这些东西的斗争必然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恶果。党必须有系统地在党员中、知识分子中和人民群众中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全党广大数量的党员特别是担负高级职务的党员在最近几年内都受到最低限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以便从思想上巩固党的统一，提高广大党员和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包围和资产阶级侵蚀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警惕，保证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不断的胜利。

选自一九五五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



## 第九讲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 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 路线的斗争

## 毛主席语录

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转引自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批语（一九五九

年八月十五日），转引自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八六页

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页

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六页

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七四八页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每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当中，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同路人来参加的。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

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转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九期

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参考文件：

##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 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摘 要)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一) 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二) 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

来已久。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期，即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作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彭德怀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也参加了

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和黄克诚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怀和黄克诚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全党全民团结一致，积极工作，而他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是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正因为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四）彭德怀这一次所犯的错误的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

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他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负责主持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他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虽然党已经坚决地批判和纠正第二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他仍然坚持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并且再三地压抑晋冀鲁豫地区的农民反封建斗争。他在华北工作时期所犯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虽经一九四五年党中央的揭发和批判，但是他始终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转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的反党活动就更为猖狂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开始，他就同高岗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高饶反党联盟崩溃了，经济战线和思想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地前进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为



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因此，他们向党进攻的实质，就是要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分裂和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机会主义的派别，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革命。

（五）如上所说，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八届八中全会认为：为了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负责，为了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负责，党必须采取坚决的严肃的态度，彻底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党要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彻底向党承认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除此以外，决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党对于彭德怀仍然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当然，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内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党内斗争没有削弱了党而恰恰是加强了党。八届八中全会确信：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进行这一次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一定将使党的队伍和人民的队伍更加巩固，党和人民的斗志更加昂扬。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

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选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 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

### 赫鲁晓夫的破产（摘录）

《红旗》杂志社论

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高潮中，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

“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在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之后，一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

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全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社会主义正气高度发扬，资本主义邪气受到沉重的打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激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激烈、最卑鄙、最疯狂的反抗。

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急先锋彭德怀，赤膊上阵了。他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他还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

彭德怀这些家伙，充当了杜勒斯、赫鲁晓夫之流的应声虫。他们恶毒地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们还叫嚷什么政治挂帅与经济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他们所谓“两者并重”，就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政治挂帅，主张钞票挂帅，搞物质刺激。他们还恶毒地攻击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妄图推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翻人民公社，对大跃进进行反攻倒算，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把中国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

庐山会议所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彭德怀这一伙，完全是一个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党篡军的阴谋集团。

《决议》指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庐山会议揭露了彭

德怀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的大阴谋，夺了他们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中路)

彭德怀一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党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在十年内战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忠实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路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还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极端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在中国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中，他用这一套来欺骗和愚弄群众，这是充分暴露了他是革命人民的敌人。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就更加猖狂了。一九五三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开始，他就伙同大野心家高岗、反革命分子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高饶联盟的实际领袖是彭德怀。他们里通外国，搞两面手法，阴谋篡党篡军。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

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主席的这段话，极其深刻地说明了我们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庐山会议以来的阶级斗争进程，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天才的科学论断。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一次大交锋。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也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彭德怀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党急先锋。当时，他们认为有机可乘，彭德怀就恶狠狠地冲了出来，而中国的赫鲁晓夫也亲自打起“反左”的旗子，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过一番较量，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打败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看到形势不妙，就连忙掩护彭德怀退却，并且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制造混乱，阴谋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信弃义，对我国进行经济破坏，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了“神圣同盟”，又一次掀起了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班老爷们看来，天快要塌下来了，神州快要陆沉了，

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们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

美蒋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座上客吴晗，首先披挂上阵，大喊大叫，替彭德怀翻案。在《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中，吴晗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叫屈，说“将我罢职理不公”，吹捧他是“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叫喊“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就是要为彭德怀进行反攻倒算作舆论准备。

(中略)

在这场反革命舆论的锣鼓声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出场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彭德怀翻案。他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的反党纲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他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抛出了一个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在这个翻案书里，他再一次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奋起迎战，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挑起的这场进攻予以迎头痛击。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亲自抓了对《海瑞罢官》的

批判。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主席对《海瑞罢官》的这一批判不仅打中了《海瑞罢官》的要害，而且打中了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

选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



## 附录：

编者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彭德怀反党集团是有计划地、有组织地、有准备地、有目的地向党猖狂进攻，妄图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彭德怀的《意见书》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黑纲领，是一个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宣战书”。胡说什么“大炼钢铁是浮夸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吹遍全国各地、各部门”，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无耻地和苏修赫鲁晓夫、美帝杜勒斯一样，污蔑我国经济的发展为“突出矛盾是比例失调”等等。现摘录这篇反面材料，供同志们批判。

### 意 见 书（摘录）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彭 德 怀

#### 上 略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

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 中 略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

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局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

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的方面。

## 下 略

## 第十讲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 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 主义路线的斗争

### 毛主席语录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我们要为这个方针奋斗。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〇六〇页

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例如，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平分地主土地和没收官僚资本，惧怕长期战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

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致推翻他们，不致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六二——一六三页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

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〇二八页

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产生怕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〇二三——一〇二四页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

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〇二四  
——一〇二五页

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〇三一  
页

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



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象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〇二六页

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〇五二页

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〇五九页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一

二页

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的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这些“左”的偏向，在过去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好在纠正这类偏向并不甚困难，几个月内已经大体上纠正过来了，或者正在纠正着。但须各级领导者着重用力才能彻底纠正此类偏向。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

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等。但这类偏向现在不是主要的，改正亦不困难。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关于情况的通报》（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九二——一九三页

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例如：

一、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这是严

重的原则性的错误。而我们的通讯社、报纸或广播电台竟将这类通讯发表。各地党委宣传部，对于此类错误竟没有任何的反映。此类宣传，在过去几个月中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相当多，以致造成了一种空气，使人们误认为似乎这是正确的领导思想。甚至因为陕北广播电台播发了某些不正确的新闻，人们竟误认为这是被中央认可的宣见。

二、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有些地区不够有力，甚至有唯成份论的错误宣传。

三、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关于既反对观望不前、又反对急性病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抓紧了，但在许多地区却助长急性病，甚至发表赞扬急性病的东西。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注意了，但在许多地区却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对于并非群众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错误意见，也无批判地接受。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

四、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对于某些解放区存在着的严重的“左”的倾向，或者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  
倾错误》（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  
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一一七五——一一七六页

一、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

一位。我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这种带头作用即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老解放区中农占多数贫雇农占少数的地方，中农的地位尤为重要。“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二、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中农和其他阶层订错了成份的，应一律改正，分了的東西应尽可能退还。在农民代表中、农民委员会中排斥中农的倾向和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将贫雇农同中农对立起来的倾向，必须纠正。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富裕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

三、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

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六三——一一六四页

全国的形势，是同志们所关心的。自从去年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展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以后，差不多在一切解放区都召开了有关整党和土地改革的大干部会议，批判了存在党内的右倾思想，揭发了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份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而在以后，在许多地区，又采取适当的步骤，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着“左”的偏向。这样，就使我党在全国的工作，在新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之下，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〇七页

另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纠正了在工作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这主要地是三个偏向。第一，在划分阶级成份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现在，这项偏向已经纠正了。这样，就大大地安定了人心，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

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的斗争中，超出了应当清查的范围；以及在税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这些，都是属于对待工商业方面的“左”的偏向。现在，这些偏向也已纠正，使工商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第三，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

二〇一——二〇二页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

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即是说，有策略的。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而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内，此项数目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

二〇八——一二一〇页



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份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跟着大规模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而产生的，部分地但是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等项“左”的错误。经过过去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的伟大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和对于自己错误的认真的纠正，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三七——一二三八页

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二  
七——一三二八页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九页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九八页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一七——一三一八页

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

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一  
九——一三二〇页

“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有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六八——四六九页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

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

在中央第三次互助合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十月），  
转引自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三九七页

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

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三九八页

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感觉，已经在广大的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迅速地发展起来。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面说过，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的，他们也有摇摆；但是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而我们的有些同志却忽略了这种情况，认为现在刚刚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已“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这是第一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还对于共产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农民对于共产党的热忱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估计不足。他们认为我们的党对于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他们悲观地描写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现时状况，认为“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不错，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我们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五年计划中就有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显然，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这是第



## 二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一——四一四页

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项经验，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愿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

我党中央是怎样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的。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到一九五二年，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是为完成恢复我国经济的任务度过的。在这个时间内，在农业方面，我们除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恢复农业生产这些任务之外，我们还在一切老解放区大大地推广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织，并且着手组织半

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经验。接着是从一九五三年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差不多三年，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经验也增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时间十八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这是可能的吗？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苏联是在一九二〇年结束国内战争的，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共有十七年时间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六年时间内完成的。在这个时间内，虽然苏联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如象《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上所说的，犯过一次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但是很快就被纠正。苏联终于用很大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农业方面完成了强大的技术改造。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第二、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

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象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已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是增产的，百分之十几的社是不增不减的，百分之几的社是减产的。这后面的两类情况是不好的，特别是减产的一类最不好，必须用大力去整顿。因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是增产的（增产的数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又因为那百分之十几的合作社虽然第一年不增不减，但是经过整顿，第二年可能增产；最后，那百分之几减产的合作社，经过整顿，第二年也有可能增产，或者进而不增不减的地位。所以，就整个说来，我们的合作化的发展是健康的，是可以基本上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的。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经过这些步骤，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训练出来。

第三、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且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成绩的好坏，决定各省各县各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也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有些地方应当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

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至于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检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必须十分抓紧，每年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应当进行几次。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例如今年七个月内，单是中央召集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会议，连同这次会议在内，就有了三次。实行这种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迅速纠正。

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来，难道不可以说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因而足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吗？我想可以这样说，并且应当这样说的，将这种方针估价“冒进”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一七——四二一页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

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

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要下决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体社员或几乎全体社员都坚决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继续干。如果有大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究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〇五——四〇六页

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几十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

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按语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



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  
序言(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

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

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六三——四六四页

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

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五四——四五五页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七七页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

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知，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七八页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五八——四五九页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八〇——四八一页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五九页

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四六一页

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

接见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部分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派，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一九五七年四月），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

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兄弟。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工作方法》（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转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转引自一九六  
六年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  
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  
报》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一  
月），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  
六年第十三期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

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 and 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

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  
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  
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  
报》

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

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转引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三年二月），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

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

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报告上的批示（一九六四年八月），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

《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

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方法，企图利用文艺阵地，作为腐蚀群众、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

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  
《人民日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

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不谈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



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转引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解放军报》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

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  
《人民日报》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  
《解放军报》

“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

转引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  
《人民日报》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  
《人民日报》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

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

〔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人民日报》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

**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

**要斗私，批修。**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转引自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  
《解放军报》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解放军报》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人

民日报》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

第七期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



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人民日报》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人民日报》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

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

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的  
批示（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人  
民日报》

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人  
民日报》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

欢迎他们去。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转引自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  
第四期

毛主席著作：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 泽 东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选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

参考文件：

##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 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摘录）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幕，于十月三十一日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就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

.....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出席了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

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为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胜利的航向。

全会认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都是正确的。

全会认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都是正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覆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一步证明了以

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指出：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曾经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或者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妄图混淆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他们



种种阴谋，已经被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群众一一揭穿了。全会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必须继续提高警惕。

……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地传播，深入人心，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每一项最新指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继续执行毛主席提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伟大原则，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进行革命大批判、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指示，使我

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完善，更好地承担起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我们必须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农业和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加出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伟大推

动力。它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

我们必须不断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巩固国防，继续做好拥军爱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对于豺狼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如果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全会认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发展。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内外交困，走投无路，日益陷于空前的孤立。

美帝和苏修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进行的侵略战争，得到了苏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帝的默契和支持。他们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彻头彻尾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他们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动，加深了帝国主义集团和修正主义集团的内部矛盾，促进了美帝和苏修国内被压迫人民群众的觉悟，同时正在激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美帝和苏修的新的伟大的斗争高潮。不管斗争的道路有什么曲折，不管美帝、苏修拚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革命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们决不孤立，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毫无疑问，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

势力必然要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都必将在自己的斗争中得到彻底翻身！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坚决支持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的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一切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

这次全会，是在国内、国际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这是一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会议，是一次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全党空前团结的会议，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朝气蓬勃的会议。全会相信，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以及世界各国革命人民都会很高兴我们这次会议的成功，而对我们这次会议感到恐惧的，只是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选自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

#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政治报告（摘录）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报告，四月十四日通过）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是一次在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召开的。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 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毛主席曾经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

的。”为了充分认识毛主席这个科学的论断，我们应当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它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的伟大历史贡献，就需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一八五二年，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六十三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使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而奋斗了一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列宁在痛斥老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多次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九十九页）

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看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三十五页）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的结论是：“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六页）

列宁还指出了“新的资产阶级”正在“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一百六十二页）

列宁指出复辟的危险还来自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国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进行它们所说的武装干涉，也就是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

一卷，第四百二十三页)

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了列宁的这些光辉的教导。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早就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一上台，就立刻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篡夺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平演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早在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即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中心仍然是政权问题。毛主席特别提醒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主席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

我们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根据毛主席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紧张的战斗。到一九五六年，基



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继续前进的紧要关头。毛主席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猖狂和我国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提醒全党：“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针对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所谓“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的谬论，毛主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还必须继续革命。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继续进行了伟大的斗争。从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从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中心，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每一个胜利，党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每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都是粉碎了以刘少奇

为代表的右的或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才取得的。

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代表。他有一条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的政治路线。他又有一条为他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多年来，刘少奇招降纳叛，搜罗了一帮子叛徒、特务、走资派，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政治历史，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着，起了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一九三九年，当毛主席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时，刘少奇抛出了他的黑《修养》。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它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而要共产党员离开伟大的革命实践去搞什么唯心主义的“修养”，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当美帝国主义武装蒋介石反革命军队，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刘少奇适应美蒋反动派的需要，抛出了所谓“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总路线和对美蒋反动派的进攻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

方针，鼓吹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要取消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把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新四军“统一”为蒋介石的“国军”，并且要把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大量复员，妄图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断送中国革命，把中国人民用鲜血夺回的胜利果实双手捧给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却跑到天津，一头栽进资本家的怀抱。他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决议的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相对抗，他大肆鼓吹“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厚颜无耻地吹捧资产阶级“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大肆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刘少奇一伙都猖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但是，既然他们是反革命，他们的阴谋就不能不暴露。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特别当苏修伙同美帝国主义、印度等国的反动派，大规模反华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猖狂起来了。

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更加完整地提出了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提出：“社会

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接着，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如果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主席已经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更加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了！

所有这些警告和斗争，并没有也不可能丝毫改变刘少奇一伙反动的阶级本性。一九六四年，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跳了出来，镇压群众，包庇走资派，并且公开地攻击毛主席倡导的对社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已经“过时”了，胡说什么不执行刘少奇的路

线就“没有资格当领导”了，他们急不可待地要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召集了中央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痛斥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奇谈怪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总结国内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得出的这个新结论，拨正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航向，指明了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英雄的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刘少奇一伙的复辟活动，已经忍耐不住了，一场阶级大搏斗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次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人

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刘少奇这个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正是在广大群众参加下，才审查清楚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把他永远开除出党，这是亿万群众的一个伟大胜利。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话，打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他们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我们要从政

治上打倒他们，也必须首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他们的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的多次批判。这次，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动了进攻。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镇压这场大革命而抛出的“二月提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特别注意揭发“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

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这个《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刘少奇集团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但这并没有为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



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

革命运动的几次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政权的重要性；刘少奇一伙所以能干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革命群众所以受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特别是当走资派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的阴谋遭到失败，刮起罪恶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广大群众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走资派，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

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地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

###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几十年来，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广大革命群众难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

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项根本原则。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极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

组织，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等基本群众。新老干部都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要坚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解剖一个到几个麻雀，不断总结经验。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斗私，批修”，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份是军队。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在保卫祖国、抗美援朝、粉碎帝、修、反的侵略的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军队的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这也是最好的战备。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兵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

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总结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把这条战线的仗打好。

####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条》中，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项政策具体化了。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

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

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对于犯错误的人，必须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必须执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执行毛主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我们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

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具体地研究本单位的情况。凡是革命大联合还不够巩固的地方，应当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凡是阶级队伍还没有清理、或者刚刚开始清理的单位，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抓紧做好。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单位，应当根据毛主席对斗、批、改各个阶段的指示，抓紧其他各项工作。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片蓬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工矿企业不断刷新生产记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全部还清了公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列宁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也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同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方针，进行调查研究，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经济战线上斗、批、改的许多政策问题。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

##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



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 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毛主席向全党指出的那样：“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设起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我们的党，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始终站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国内外敌人极其强大、情况十分复杂

的环境中，我们党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才使党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深深懂得，离开了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建党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党内两条路战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

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正是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重要时刻，刘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抄录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话时，再一次故意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结论，明确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面目。刘少奇还继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

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反动谬论，就是妄图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党，使党员越“养”越“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各级党组织，广大的共产党员，经受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经受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这场大革命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学习和宣传，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传，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学习和宣传，都

不能只进行一次，而要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刚冒头时，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抵制，保证我们党始终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航道胜利前进。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修改党的章程。中央已将党章草案提请大会讨论。这个草案是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共同参加起草的。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以来，中央收到了几千份草案。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党章草案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又一次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可以说，新党章草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志，是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殊别重要的是，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相信，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以后，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 七、关于我国和外国关系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关系问题。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的。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

组织，全世界的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许多友好国家、友好团体和个人，都给了我们热情的赞扬和支持。……我们坚决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当前世界的总趋势，还是毛主席说的那两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方面，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正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百八十二页）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

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四十九页）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主席指出的这个伟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指引着我们在同帝、修、反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走下坡路。尼克松上台以后，面临着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面临着全世界人民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巨大反抗，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的困难局面。尼克松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样，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表面上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实际上更大规模地扩军备战。美国的军费开

支，逐年增加。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它把侵略军队派到很多国家，还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它搞了那么多飞机、大炮，那么多核弹、导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用来吓唬人民、镇压人民、屠杀人民、霸占世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它到处陷入与人民为敌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包围和痛击之中，并且必将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规模的革命。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纸老虎。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还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全党，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逐步学会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社会主义，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宣告破产。同时，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履行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派几十万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



挑衅，就是苏修最近的两次丑恶表演。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它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即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样。列宁痛斥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四百五十八页）这完全适用于今天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成的苏修叛徒集团。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这一小撮叛徒集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由于苏联政府一手制造了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事件，中苏边界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苏边界问题，同我国和其他一些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一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根据这个主张，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圆满地解决了同他们的边界问题。只有苏联、印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由于印度反动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要我们承认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都没有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妄图进一步侵占一直在我国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而破坏了中印边界谈判，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十九世纪下半叶，那时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大片中国领土，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这种强盗行径，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愤怒谴责。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伟大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

“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我国政府本着对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早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四年，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谈判。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主张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新沙皇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拒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还坚持

要我国承认他们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苏联政府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使谈判遭到了破坏。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三月二十二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三月二十九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我们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坚持实行的政策。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仍然坚持这样做。

我们历来主张，各国的内部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

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同苏修叛徒集团丑恶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苏修叛徒集团口口声声“兄弟党”、“兄弟国家”，实际上把自己当作老子党，当作可以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新沙皇。他们不但对于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破坏和颠覆，而且对于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党，对于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一切略有不同意见的国家，都摆出一副凶恶的架子，进行镇压、破坏、颠覆，甚至出兵侵占他们的所谓“兄弟国家”，绑架他们的所谓“兄弟党”的成员，无所不为。他们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强盗行为，决定了他们必然覆灭的下场。

美帝、苏修总想“孤立”中国，这是中国的光荣。他们猖狂反华，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反而激发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反而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同美帝、苏修划清了界限。今天，决定世界命运的，不是帝、修、反，而是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各国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是新生的力量，有无限广阔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坚决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帝反修斗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底，坚决支持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坚持支持美国无产阶级、青年学生、黑人群众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

各国人民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日本、西欧和大洋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一切反抗美帝、苏修侵略和压迫的正义斗争。所有受到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毛主席早就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们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充满了胜利信心，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一定要把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美帝、苏修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埋葬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

## 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

时刻，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刻，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我们大会的代表，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大量的新鲜血液。产业工人党员代表、贫下中农党员代表和女代表数量之多，是我们党历次代表大会所从来没有过的。人民解放军的党员代表中，有老红军战士，也有新战士。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多的代表，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共同商量和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这就标志着我们的代表大会，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

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我们的祖国空前统一，我国人民形成了极其广泛的革命大团结。这个大团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个兄弟民族，包括长期以来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了好事的爱国民众，包括广大海外爱国侨胞和港澳爱国同胞，包括在美蒋反动派压榨下的台湾爱国同胞，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我们相信，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毛主席这个高瞻远瞩的雄伟展望，照耀着今后我们前进的道路，激励着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英勇奋斗。

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选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附录：

## 时局问题的报告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刘少奇

同志们，目前的时局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从停战协定签字，停战命令发布以后，各个地方的战斗，除了个别地方尚有冲突以外，一般的是停止了。现在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已获得了重大的成果。政治协商会议昨天已经闭幕了，决议案今天就可以发表，同志们明天就可以看到。

政协会议是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改组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参加政府，决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的国务机关。国民政府的委员国民党只占一半，另一半为共产党和各党及无党无派。他们要保持否决权，也可能得到否决权。并通过一个和平建国纲领，作为在宪法实施以前过渡时期的政府施政纲领，这个纲领是合乎民主原则的，基本上说是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对于宪法，也决定要修改国民党的五五宪草实行议会制，内阁制，决定地方自治，省为最高自治单位，省可以制定省宪，省长民选，县长、专员民选更不用说了，关于军队也通过决议，决定军队属于国家，属于人民，确定军党分离、军民分治、



以政治军为整军原则。决定整编全国军队，无论国民党的军队或共产党的军队，都实行公平合理的整编。国民大会问题也达成了妥协，决定这次国民大会只是立宪会议制定宪法，以前选举的代表我们现在承认他，但同时也要增加很多代表，我们在国民大会中有否决权，好的通过，不好的不通过。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以上五个决议案。这些决议案基本上是好的，没有坏的，当然好的还没有写完，还有很多好的东西没有写上去，但是写上去的就不算坏。我们认为这些决议案，在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成立以及它的实行，就会做到在全国范围内使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开始破坏，全国民主化开始实现，使我们中国变成为一个民主化的国家。进一步地巩固国内和平，并且使我们的党及我们党所建立的军队及解放区在全国范围内走向合法化。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就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已经开始了，不是将要开始，虽然我们经过了許多曲折道路，但我们应当认识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准备在延安及各解放区，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域各大城市开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庆祝中国走上民主化的新阶段。这些决议草案为什么能获得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好的结果？原因在那里？这个原因不是简单的，而是有深刻的国际的和国内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

第一，在国际上来说，全世界人民战胜了法西斯，全世界民主运动高涨起来了。特别是莫斯科这次三外长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决议，这个决议就是要中国走向民主化。

这个决议不仅是通过而且要实行，非实行不可，不实行要干涉，实行干涉的以马歇尔为代表，马歇尔不仅代表美国政府，实际上是执行三外长会议决议的代表。

第二，由于我们党和解放区强大，这个强大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是消灭不了的，特别是在最近四个月以来我们对国民党向解放区的进攻，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战。打垮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使得国民党中有些人想以武力解决共产党和解放区的企图成为不可能，使得国民党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而国际上又逼迫它非解决不可，这就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放弃一党独裁而采用民主的方法实行全国民主化来解决国内问题。

第三、全国广大人民及其他民主党派坚决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国家民主化。

第四、国民党自己内部有很多的困难，国民党在全国高叫统一，可是国民党自己就不统一，它也没有办法统一它自己，内部意见分歧得很，主战的主战，主和的主和，国民党内部的困难也使得国民党内不能再以一党独裁的方法照旧统治下去。

由于以上客观原因就使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它的一党独裁，不能不实行全国民主化，接受人民和各党派的要求，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并且承认我们的解放区和我们的军队，承认全国各党派的合法化，这就是政协会议之所以获得重大成果的原因。

我们应当认识这些决议的获得，这些决议的实行，还只是全国民主化的开始。当然我们解放区，老早就开始了，在全国范围来说，则是现在才开始。国民党的独裁也还只是开始破坏，离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彻底破坏，及全国彻底民主化，

还是很远的。要达到国民党独裁的彻底破坏和全国彻底民主化，那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经过许多奋斗克服许多困难，才能达到的。要全国彻底民主化，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使中国工业化。现在离这个彻底还很远，但现在已经开始了，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我们认为只有我们的国家真正开始了民主化，全国人民有了初步的言论集会出版等政治上的自由，及各党派的合法化，只要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估计到各个地方的民主运动、群众运动就会逐渐的广泛的开展起来。全国民主运动将发展成为不可抵御的力量。全国的民主运动、群众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就会继续破坏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就会破坏封建残余和专制主义，就会继续使我们国家走上民主化。因此中国彻底民主化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是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条件很好，和中国过去任何一次民主革命获得胜利的情况不同，是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好条件，和好的环境，使中国民主化可以完成。这就是世界上有三个主要国家——英美苏，其中有强大的无产阶级国家——苏联，来援助中国的民主化，这就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顺利的国际环境。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当着中国民主革命正要成功要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主要列强就来干涉，把中国民主革命搞失败打垮。如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起来了，各帝国主义就帮助袁世凯把孙中山压倒。北伐战争也是一样，革命刚到胜利，帝国主义就帮助中国反动势力使革命失败，这次因法西斯打倒了，英美以及世界上其他各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而且国际资产阶级也需要和平，它这次不是反对中国民主化，而是赞成和帮助中国民主化，这在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上已经表现出来了。在杜鲁门

声明中表现了这一点。中国必须成为团结民主的中国，不能是封建的落后的中国。这是好的国际环境。在国内，中国有三个主要的政党合作要使中国走上民主化，其中有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再就是国民党，民主同盟，这三个党合作使中国民主化，这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国内条件。同时中国人民有三个主要阶级要求民主化，这就是工农劳动人民、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中间派，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要求中国民主化，变为民主的国家，不能是封建的国家，半封建的国家，而且在三个主要阶级中已经有觉悟了的或正在觉悟的工农劳动人民，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群众基础、群众条件，这三个国家，三个政党，三种人民合作起来要使中国走上民主化。三个国家中有苏联，三个党中有强大的共产党，三个阶级里面有工农劳动群众。由于这样的因素，就使得中国只能照着这个方向走，不能走相反的方向。这样保证了中国继续走上民主化的前途。虽然还是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开始破坏，全国民主化还只是开始实行，但是中国有光明前途。有三国、三党、三民保证中国继续走上民主化。那么反人民反民主势力怎么样？它还存在而且还很强大，在国内和国际的反民主势力依然还很强大，依然还拚命的反对中国民主化。蒋介石在今天之所以接受人民的要求，实行民主改革，也和以前实行抗战一样，带着很大被迫性、强迫性。他今天所以接受人民的决议，讲一篇很漂亮的话（蒋介石昨天讲了很漂亮的话）说：一定要实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案，并说我要共产党也执行。蒋介石所以能讲这样的话是被迫的，带着浓厚的被迫性，国民党蒋介石实行民主带着浓厚的被迫性，这就使中国继续走上民主化的道

路上要经过许多曲折弯转的路子。这些阻碍，这些困难还须克服。为什么不一直走？为什么这样一直走（作手势）走不下去？一定要曲折才能走下去？是因为有反民主势力的阻碍，将来还可能发生不实行决议，不实行民主，起来暴动等等事情。使中国走上民主化要走弯路，并且还要经过多少年的奋斗，多少年的改革，多少年的建设，所以中国继续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还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因为反民主势力很强大的存在，但是中国要走民主这个方向，这个趋势是确定了的，不可抵御的。反民主势力是可以克服的。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主席这两句话现在还是适用的。这曲折有各种各样，也可能不再经过内战，就可以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所谓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胜利，是通过一个宪法，而且根据这个宪法建立议会制度；中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那就是中国工业化和土地革命。

中国许多大资产阶级和英美的大资产阶级企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反对苏联的阵地，想把中国变成反苏战场与战争基地，有这样的阴谋。但是在全世界全国人民觉悟的条件下可以破坏，可以把它阻止住，而且必须阻止。能不能阻止或破坏得了，那要看将来的斗争来决定，可能使它不能实现。虽有很多阻力，反民主势力依然很强大，道路是曲折的，长期的，但是今天我们应当讲，中国是已经确定的开始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了。我党从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以后，坚持和平方针，全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这个方针今天已经胜利了。国内主张用武力解决武力统一的主战派，内战挑拨者，是失败了。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所以从此中国革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

众的、议会斗争形式。从前我们很强调中国革命的形式是武装斗争，这在今后就不大适应了，要转变了。今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不是武装斗争，是非武装的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是主要形式，用政治方法解决国内问题。外面有一句话：“国共问题不能用武力解决，不能用内战解决，要用政治方法来 解决。”我们也采用这个口号，国内许多问题不能用武装的方式来解决，不能用打的方式来解决，要用政治方式解决。所谓政治方式就是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形式。这一点是很大的变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主要斗争形式变化了，所以我们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改组，实行转变，党要适应目前这个新的形式，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变到非武装的政治斗争。我们有些同志讲：讲那些干什么，一枪一冲就解决了，现在这个话不能讲，不能冲了，只晓得冲，现在不准你冲，一冲把你冲昏了，今天要用合法的方法来解决 问题，在议会上宣传我们的政策、主张，来驳倒国民党的政策、主张，争取群众对我们的同情和拥护，在选举时投我们的票。这个变化是一个带基本性质的变化，而且牵扯的很广泛，牵扯到党的全部工作需要转变，需要加以改组。

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我们党就参加中央政府，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参加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省政府，县政府也可能参加，从此我们就成为政府党之一了，不是在野而是在朝了。我们有些人要做官了，自中央政府至区政府里都得去做官。这些官我们老早就做过了，边区政府主席还不是官？中央政府的官也曾做过了，但是人家一打就取消了。这回是不是一打就取消呢？那是不行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现在我们有强大的党，有我们强大的军队和解放区，有这样的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不是一巴掌就可以打得下去的，这次参加政府是巩固的长期的，不是参加一下子的。我们参加他们的政府，那么我们的政府他们是不是会来参加呢？他们会来参加的。国民党以及各党派会到解放区来进行社会活动的，来办报纸，办通讯社，设立党部，以致参加我们的政府，你不要他来他会说：“你不给他（我）言论出版自由，”他说：“我们给你这些自由需要共产党也给这样自由”，这一件事不是简单的。

我们的军队也要在全国军队实行整编计划下，进行整编，我们的军队要取得合法化，要成为正式国军，成为国防军，成为地方保安队，成为自卫军。要实行整编，那么我们的党在整编以后的军队中间，就要实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我们党在军队里头的支部、总支、党务委员会、政治委员，就得取消。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在军队里头的组织，取消他们的党部，我们也是一样。他取消，我们也取消，这样过一个时期以后——整编以后，我们党就要停止对军队直接下命令，停止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所有军队统一在国防部。国防部里而也有我们的人参加，军队要统一指挥，但是我们军队里头所有党员的党籍要保留，整编后的军队干部，仍是原来不动的，不是派一大批国民党来。我们党和军队的关系就要做到和国民党差不多，他怎样对付他的军队，我们也怎样对付我们的军队；他办得好，我们也办得好。国民党说我们的军队不能国家化，军队国家化这一下可把你堵死了，我们能取消党部，你们就不能不取消党部。好，你取消我们也取消，你能办到我们也能办到，你不下命令我们也不下，你在军队里怎样

办，我们也怎样办。这种形式是一个很大的革命。这个革命是不是必要呢？是否可以这样革命呢？是否还可照我们的老样子做下去呢？照我们的老样子下去是封闭解放区。国民党不来，报纸他也不办，我们的军队也不整编，我们的党部还是照常办，那就方便一些，是独立自主的。可是现在不能那么办，那就不方便。那么方便一点好不好？要改一下，不改是不是可以？不改是不可以的，改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我们就改变一下我们党与军队的关系。我们党在十八年奋斗中创造了这支队伍，它只有采取这个形式才能合法，才能取得合法的地位。现在我们军队就是共产党的军队，登报说是政府军，共产军，美国的报纸也是这样说，说解放区是共产党的区域。他们不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英美不承认，各国都不承认，各党派也不承认。那么怎样才取得他们的承认呢？那就是改变形式。要取消我们军队党的组织，这样和国民党一样，他们就没有理由不承认了，我们军队必须实行这个改变，才能取得合法地位，取得国内各党派与各国政府的承认。并且用此种形式可把我们军队保留起来。因为这支军队是我们党在十八年来花了重大力量，中国人民花了重大力量，创造起来的，所以在目前必须采用各种形式加以保留。那么，这个让步是不是退让？是退了一步。因为这个让步是必要的，这样能够取得我们军队的合法地位，能够保留，并且用这个让步换得了别的东西：换得了我们军队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换得了国家民主化；同时也换得了国民党的军队也国家化；共产党不能使用军队，国民党也不能使用军队，换得了全国军队脱离国民党军队个人所有，使军队国家化，全国军队统一起来，所以这个让步是合乎全国人民利益的，合乎



全党利益的。如果不做这个让步，可不可以？就不可以，军队、党、解放区，就不能取得合法地位。你可以使用军队，人家也可以使用军队，内战就无从制止，中国就要分裂，全国民主化，就不可能，所以这个让步是非让不可的。但是，各种让步是否改变了我们军队的本质？改变了解放区的本质呢？因为做这个让步共产党的支部取消了，政治委员不要了，我们的军队是不是就不是我（们）的了呢？那也不是这样，各种让步丝毫没有改变我们军队的本质，并且继续提高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因此，我们的军队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全体党员还在军队里头工作，党籍仍然保留，他们还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人民的先锋队，依然是人民的军队。决不会因为停止我们党的组织在军队里头的活动，而使这支军队，就不是人民的军队了，就瓦解堕落，反人民背叛人民，那是不会的。所以这个让步，对于我们的军队本质没有改变，并且还得了许多东西。因此这个让步是必要的，这个买卖是化（划）得来的赚了钱。在各种改变以后，我们的同志、干部，在军队中工作，就要更加团结，更加有纪律，更加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加加强政治工作，因为党不直接领导他们了，那么不守纪律怎么办？扯皮怎么办？我不满意你，你不满意我，那就很难办。就是说要团结，虽不满意就算了吧！要顾及到大问题，班长和连长扯皮，政委和连长扯皮，现在可以开会批评，可以命令，以后就不这样搞。以后他们不团结，或者发生其他问题只有他们自己解决，所以我们在军队里工作的党员就更自觉守纪律，把觉悟程度提得更高。只要我们军队的同志能够做到这些条件，那就什么也不怕。为什么需要更加团结，遵守纪

律，提高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加强政治工作呢？正是因为以后党不给他指示，不下命令了。所以必须依靠他们的自觉性，自动性，创造性，他们只能从党的一般号召、党的一般政策中得到间接的指示，从这里来了解党的指导，了解活动的方向。直接的指示是不可能了，就是说在以后上边派人来，打电报，写信等来指示是不可能了，就要听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延安新华社的广播，间接的知道党的政策怎么样，党怎样办我们也怎样办，以后就靠这样做。假如你不看报，不听新华社广播，不听党的一般号召，就不会了解党的政策，也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工作。

以后我们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他们只能根据我们党的方向进行工作，那就要更加守纪律，更加团结，更加了解马列主义，加强马列主义判断力的政治修养。没有马列主义的修养他的工作就作不好。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我们的绝大多数同志是能这样做的。虽然我们不开党的支部会议，但一定能够保持党的军队，党员干部依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保持并继续提高我们军队的本质。我们的军队在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在党中央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锻炼出来。它应该成熟，可以离开党的直接领导而不会犯错误，少数个别分子对党不满有反党行为，他们堕落背叛人民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当警惕，但大多数党员我们相信他们离开党的直接领导以后，只要他们看报纸，听消息，了解党的政策，更能把他们锻炼出来，锻炼得更加成功。可以独立决定方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决定以后，我们的党员在军队中的工作方式要有这样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不是明天就要做呢？那还不是。那还

要等几个月，等情况大致定了，民主实行了，各党各派合法，我们参加了政府，军队改编以后，中央下一个“命令”说改变，那时就改变。现在还照老样子，主要是照现在的样子，再办几个月。

现在全国武装斗争停止了，再（在）个别地方国民党还有向我们袭击的可能，我们应该警惕。但内战是要停止的。军队里工作方式要改变，解放区的工作方式要改变，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域要改变，全国的斗争方式要改变，全国的组织方式也要改变。即是说把武装斗争为主要的的方式转到非武装的群众性的斗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为主的方式。那么以后这样非武装的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就非常重要，我们一定学会有些同志要去进行这个斗争。等一个时期这些重要性，同志们就会在事实可以看到。将来全国出风头的，当代表的，就是做这些斗争的人，而不是拿枪杆的人。抗战前搞过救亡运动的人，知道“七七”抗战以前的抗战方式，主要是依靠党员到处发表讲演，散发传单，开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因此“一二·九”运动就非常出风头。章乃器、邹韬奋、沈钧儒等救国七君子，那时被称为全国的救国领袖，以后把七君子关在班房里，就更加提高了他们的地位。但“七七”抗战后怎么样了呢？七君子看不到了，所看到的，是平型关，台儿庄拿枪杆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拿枪杆子解决问题，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现在参加政协会议就很出风头，飞机接，飞机送，到处发表谈话，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军队里的同志还不是打手榴弹，练兵，他的重要性就慢慢的看不出来了。相反的，如果没有军队也就没有那些出风头的人的地位，今天参加了政府，明天就可以把你

赶出来，不过军队的重要性，现在显不出来了。

现在主要斗争形式改变了，只要我们能掌握这个主要斗争的形式，那就会继续提高我们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否则就不能提高，因此我们党的继续发展，我们党的壮大，保持并提高我们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中国民主事业的继续前进，基本上非依靠这些群众斗争，议会斗争的人不行，所以我们必须掌握这个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的方式，并要处于主动而不是被动，他们坐着飞机跑来跑去，发表谈话，发表的谈话大家赞成，我们党的地位就会提高。

我们想用打的办法派宋邵（勃）文当北平市长，没有进去，将来也许依靠宣传，依靠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就可能当上北平市长。我们要取得阵地，要靠议会斗争，不是说国民党的人一讲话，老百姓就帮助他，投他的票，而不投我们的票，使我们失了阵地，那我们的地位就要取消。所以我们党政治地位的提高，主要依靠会搞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不是依靠枪杆子的武装斗争方式解决问题，而是用政治方法解决，就是说用非武装的斗争形式解决。所以以后我们党的发展，民主的前进，革命的胜利，依靠我们党善于组织指导这些非武装的群众斗争，议会斗争，依靠我们党善于靠乡村统一战线和城市统一战线，乡村统一战线和城市统一战线配合起来，善于在群众中搞统一战线。各党派合作和下层配合起来，今后我们党的工作要推广到全国范围一切城市中去，我们党在全国取得合法地位，我们参加政府后，我们要到全国各地去办党部，解放区的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固然要作，国民党占优势的区域也要做，这两种工作同等重

要，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同等重要。

今后要在全国发展工业，我们要努力参加全国范围的经济建（设）工作，现在政治协商会议开成功，实行了和平民主，我们参加了政府，美国就对中间借款二十万万美元，借二十万万美元干什么用？是今天贪污吗？不是拿来在善后工作上用，除了整军工作上用点外，主要是开工厂，办经济建设，参加全国范围的经济建设工作，如：工业商业农业各方面，我们通过去参加，如果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善于组织这种工作，善于进行这种工作，善于进行这样的斗争，又善于在议会里演说，能用演说的道理把人家冲走，掌握群众才能有把握，如果我们党善于进行这种合法的斗争，善于进行这种工作，而且能把这些工作做好，那么我们党才会继续发展，中国革命才会继续前进，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如果我们党不善于组织与进行这种合法斗争，那么我们党就不（会）发展，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就可能被人家把我们孤立起来，可能被人家把我们缩小，因为这是一个主要的斗争。关于利用新的斗争形式，新的组织形式，在抗战中间我们党做的很多，一般的来讲我们比国民党要好一些，搞议会斗争我们比国民党熟练些，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缺点，因为我们在这狭小的范围里面独立自主的搞惯了，能和人家合作，但是还有很多缺点，因此我们就需要克服这些缺点，需要熟悉这种新的斗争形式，这个问题很重要，不会这一套，事情就办不好。

今天我们党内主要危险的偏向是什么呢？是狭隘的关门主义，左的关门主义，这是今天我们党内存在的偏向，如果不转变，总是老一套，对于新的斗争形式，新的组织形式不

去运用，不愿意熟悉，觉得没有必要，这种偏向是要妨碍党的工作。

这种偏向的来源也不是简单的，他的根源就是在这十八年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反动中间，我们党和国民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由于这种原因和客观形势，这就使我们的党内和党外有很多人不相信内战会真正可以停止，国内和平真正可以到来，蒋介石可以不打我们，同时还保证不打我们的解放区、军队和党，那就很难相信。本来打了十八年，打的你死我活的，突然不打，谁知道靠得住靠不住？他们不相信国民党，尤其不相信蒋介石，也能在各方面逼迫之下实行民主改革，就是蒋介石可以搞点民主，蒋介石还可以和我们合作来办民主，办建国，这是不相信的，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也不相信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我们说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来了，他说没有来，你说来了，他还要看，看到底来了没有？他采取怀疑的态度，不相信的态度，他认为新阶段还没有来，所以党的工作是不是要转变？他觉得没有必要，你要搞和平民主合法议会斗争，要转变，要熟悉新的一套，他就埋怨你，因为他认（为）新阶段还没有来。今天党的工作有转变之必要，有熟悉新的斗争形式，新的组织形式之必要，但他总是老一套，总想军队是不是要转变？转变掉怎么办？靠不住！还是独立自主吧！解放区也独立自主，他采取旧的形式，不愿同国民党合作，不重视合法斗争，不重视国民党区域的工作，这样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里面，把党和全国广大群众隔离，这种倾向是危险的，对今天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是不适合的。因此我们在党里做详细解释，解释目前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和党的新任务；党

的新任务是进行非武装的、和平的、合法的议会斗争，使全国民主化。要详细解释和平民主阶段已经到来了，和平真的来了，内战真的停止了，虽然现在还在那里零零碎碎的打，但是要完全停止武装斗争，停止了以后就不是武装斗争为主，而是和平斗争为主了。要详细解释克服“左”的关门主义，克服了这种“左”的关门主义，才能使我们党的全部工作转变到新的形式。我想这个任务我们是能做到的，我们的这些偏向是能够克服的（党内外是一样），甚至党外有我们很多朋友，比我们很多党员还“左”一些，他们死不相信蒋介石可以搞民主，可以合作，那一套是使人不相信的。我认得会（曾）有过李锡九这位老先生，在抗战开始的头一二年，他就不相信蒋介石抗战会抗下去。今天讲起来也讲不通。党外有很多这样的好人，他们比我们党里面的党员还左，很难办。他们到这一边去了。他们没有马列主义，也没有一个中央给他们解释。我们有一个中央，有人犯了错误，毛主席一讲，中央一讲，问题就解决了。他们没有那样一个中央，他们没有组织也没有人给他讲，所以偏向就偏到一边去了。偏的不正了整也整不过来。因此还要我们党中央和党员都向他们解释说服，使他们好好的想一想。这是我们党内今天的偏向。但是等一个时候偏向就不同了，右倾的可能起来变为主要的危险。这要等到什么时候？要等到和平民主新阶段确实到来和更加确定了时，全国的广大群众可清楚的看到真正的和平来了，内战真正的停止了，国民党真正实行了新的一套，内阁制搞起来了，到那时候新阶段不可怀疑了，右倾偏向就可能生长起来，而且成为主要的偏向，觉得蒋介石满好，于是蒋介石有没有革命性的问题又来了，因为事实

上好多民主的改革是经过蒋介石的手作的，许多漂亮事是经过蒋介石的手作的。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蒋介石召集的，决议案也是蒋介石通过的，将来开国民代表大会实行宪政还不是经过蒋介石的手作！？这样算起来一大堆，于是蒋介石有好处，蒋介石革命，这些问题都来了。“左”的偏向（蒋介石不搞民主）没有了，因为事实清楚，现在和平了，不会打内战了，大家看得清楚，“左”的偏向离开了客观基础。右的偏向的客观基础又很多，觉得蒋介石满好，美国满好，马歇尔满好，他们帮助中国。现在马歇尔是做了好事，内战是他停止的，马歇尔若不来，要蒋介石不打内战那是不会的。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也是马歇尔在那里搞的，他手里拿着二十万万美金说：“政治协商会议开不好，这二十万万美金就不给，开好了就给”。所以说美国马歇尔也做了好事。相信国民党，相信外国，过分相信，今天说了就信。没有警惕性，享乐的思想就来了。这个思想以（一）来，右倾的情绪可能生长，而且可能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但是大危险我想也没有以致于影响党的路线，现在也不会；因为我们经过了整风，又经过了“七大”，我们党有充分经验，克服“左”右倾偏向。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也不会有大的危险。不管“左”的偏向也好，右的偏向也好，将来一个时候可能要全力克服右倾情绪。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主力是克服“左”倾关门主义。这是目前新形势、新时局之下我们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准备发表，蒋介石的演说也准备发表，虽然蒋介石的那些话是毒我们的，但是有些话却是蒋介石多少年来第一次所说的好话。



## 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刘少奇

各位先生的意见很好，总起来说，不外是这么几个问题：进出口政策，税收政策，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我这次不能多谈，以后黄市长可以多谈。

政府的方针很明确。现在整个形势是这样的：反对帝国主义是很清楚的了，大门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这件事，我们的祖宗几百年来经过多少次流血斗争都没有作到，今天我们一定要作到，也可以作到。只要把钥匙拿到自己手里，开关如意，中国工业就有了大保障。虽然现在整个国民经济还不能完全独立，还有许多原料零件等等，须要依靠外国，但是因为钥匙在手，只要有十几年时间，国内经济就可以逐渐独立。所以帝国主义基本上是反对得了的。其次，封建势力由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也可以消灭；官僚资本主义，在军事发展下，也可以解决。因此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在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所谓生产，无非指的是工业农业。一方面是生产，一方面要有分配，因此商业，进出口贸易，内地贸易，运输业等都要和生产配合。

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国家的以外，还有私人的。在工业方面一部分是国家资本，绝大部分是私人资本；至于农业，则全部是私人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近代化的工业生产只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农业和小手工业。在百分之十的工业中，一部分是国营，一部分是私营的，将来还可以组织一部分合作社经济。国营和私营企业之间，可能会有竞争，有矛盾，但是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也许将来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并不反对那样生产发展得多。重要的是配合问题。前次和几位先生谈话，谈到怎样使公私营企业结合起来。有位先生说，你订一个计划，我们私营企业来帮你的忙，这意见很好。公私合作有全面的，有暂时的，有长期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 and 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的。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不过这合作是完全自由的并不强制。

上次谈话，有些先生说怕我们的贸易公司，说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它竞争呢？这也未可厚非。这就是自由竞争！就是学的你们的么！不过贸易公司统制原料、市场，是普通生意人的办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上回李独尘先生谈到临清销盐问题，我已经告诉临清贸易公司不要这样作，并且要李先生再去卖。我主张采取这样的方针，就是：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

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不过这应是双方的，不但贸易公司要公私兼顾，你们也要公私兼顾，顾到国家经济。贸易公司的利润，你要不照顾它，它也就不会照顾你。有人又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余汤。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是笼罩在头上的，还只是些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我们也主张对私人资本有限制，但是今天有好些地方，说限制等于不限制，譬如铁路、航空，中国今天还没有那末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来和国营的竞争。将来限制恐怕要多一点，如工厂愈办愈多，中国已不是产业落后，而已达到进步饱和了；生产不是太少，而是过剩了，那时就必须限制。不然，中国就要变成帝国主义，到国际上去抢市场，一抢就要打仗。要是那样的话，今天的政策便是失败的。不变成工业国不得了，一变成工业国更不得了。这些事情还远得很，但今天我们就可以有计划的避免，这一点政府可以做。譬如办多少纱厂以后，不要了，可以限制国家和私人再办。我们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义，不是走旧的资本主义。要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公私兼顾就是一种限制，没有限制，那能兼顾？象李烛尘先生所提的，临清贸易公司应提高盐价，这就是要限制贸易自由，限制临清国营贸易公司有减低盐价的自由。劳资两利也是一个限制政策，如果只利资方不利劳方，是对资方没有限制。又比如税收问题，你们提议将百分之三减少为百分之一点五，是税收限制了你们发展，因此你们提议要我们把税收限制一下，这也是相互的。城乡关系上，现在工业品

太贵，农业品太贱，这对农民不利，应该相互照顾合作，所以也有限制性。

关于几个具体问题：

对外贸易问题提的意见很好，可以由对外贸易处与有关方面商量，想办法。统销如果妨碍出口，可以修改。修改方法不一定取消已颁布的统销命令，你们出口可以在互利的条件下与政府获得适当解决。

贷款方面也要互相商量。恢复工业需要一大批资金，光是公营厂房修补一下，就需要十五亿人民币。但是贷款仍需要办，应该统一筹划，公私兼顾，大家分一点。是不能全部够，我想是不可能的。国家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也不影响生产遭受破坏，应尽可能投资工业。加发票子，如果不致影响生产降低，可以发。问题是纸。章程可以具体研究一下，如临时贷几批，立即生产见效，应立即做。

税收问题：天津税收用旧税率。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经验，石家庄半年多不收税，反而引起工商业家恐慌，以为要算他们，不但不感谢，而且还不放心。所以在天津未解放前，我们就打电报通知，天津一解放就照国民党的办法收（除掉苛捐杂税以外），收几个月再慢慢改。收的结果不坏，出我意外。现在政府一个月开支四亿，已收了八亿税，还有四亿没收起。据你们说税收得多了。你们既可以照数交给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同样交给我们呢？你们拥护人民政府么！可见国民党贪污很厉害。我们以后可以在财政上公开采取老实态度，收多了告诉你们，有困难要求你们解决，同样，你们也应该采取老实态度。挑皮捣蛋、尔虞我诈，大家反对。过去在国民党下面，老实吃不开，现在人民政府下面，只有

采取老实态度才吃得开。国民党收税时，你们用的是两本帐，所以实际收得少。这次税收得多，我们有一半功劳，因为我们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不贪污，你们也有一半功劳，因为两本帐变为一本帐。这样，中国就有救，有前途。

税收多了，要作点事。要把工厂玻璃安起来，以两个月的盈余来开支就够了。其次，还有很多事业要办，如医院等建设。

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么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议个新的税率表，由税务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但大家应该负责任的提，要公私兼顾。职工所得税也得和他们商量。

你们现在觉得负担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国家经费是困难的，原因是打仗。这次天津战役，单八二迫击炮弹打了十万发，一颗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生产总收入。现在又过了长江，有二百一十万战士同时在前线作战，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兵力。但全世界上我们的兵还是最便宜的（美国兵每人每年要用一万七千元美金，而我们的兵一年用不到一百至二百白洋）。政府财政这样困难，主要负担是农民，有负担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夫子，又要支持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你们负担比农民轻。所以他们报怨工人、商人、资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声很普遍。这点请你们要顾到。城市负担多一点，可以说服农人。我主张把这次的征额在报纸上公布，使农民知道城市里的人也负担了一些。

不过，这样的时期是不会很长的，大家咬紧牙关，过一年或者两年，炮弹不打了，兵不养这么多了，有的兵参加生产事业了，情况就会改变。现在你们须要多负担一点，税收恐怕一般还要多一些，当然，如果妨碍到生产是应当照顾的。可是，今天处在困难的情形下，工厂能够不断生产，不赔本，就算是我们胜利了，公营企业中甚至有的还蚀本，也要继续开下去，用赚钱的厂贴赔钱的厂。今天工业利润不可能很多，但工业的前途很光明。眼光要放远一些，赚大钱的时候在后头。

你们有些困难，象原料等问题，可以向政府声明，政府能办到的，一定尽量帮助。譬如到鲁豫收买牛皮，完全没有困难。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就希望你们提意见，和我们合作。上次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很好。将来是要成立人民代表大会的，但是目前人民还没有组织起来，不宜于成立代表会。在这过渡时期里，我想，不妨在华北成立一个经济委员会，下面分几个部门，如税收、原料、贷款等等，看需要来说；产业界人士，工程师和专家都可以参加，一切问题和意见，都可以向这个会集中。

对外通电的问题，可以商量。和外通邮电，只要在不丧失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经过外商与外国建立关系的，这是临时办法，不是永久的。和帝国主义来往，只要不丧失主权，不致束缚我们的手足，和外国人作生意有好处就做（他也愿意办，两利），这是讲生意；政治问题是另外一回事，诸位可以不谈。中国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年，今天帝国主义来找到我们，我们这口气不能忘记，就是说，不要忘记民族立场。有好生意还是做。

商标假冒，是不好的。

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是临时的）。不是要限制股息呢？李烛尘先生主张要限制，以利润的三分之一给工人，三分之一作公积金，三分之一作股息。我觉得顶好现在不加限制，提高或降低，要看对什么有利。固然，股息高了，就叫人浪费，但我赞成穿绸缎，抹胭脂水粉，大吃大喝，只要钱拿到工业上去，拿出来流通，总比埋在地下好。据说现在投机利润最多，其次是商业利润，最低的是工业利润，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投机家破产最好），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才算合法？我认为赚多少钱都合法！

私人房产问题：听说现在有的房主不修房子，怕分。我们的方针是，除了官僚资产阶级的房子没收外，一律不没收，而且保证私人产权，鼓励出租。政府不号召减租运动，而号召交租，房租由双方议定，有纠纷再由政府调解。有钱可投资于房产。至于地皮问题是另一件事，现在不作宣布，恐怕将来要归国有。地皮是国有，房产是私有。将来要盖房子、盖工厂，可以向国家领地皮，不必花钱买，只由国家收一点地皮税、房产税，好的多收点，坏的少收点，房子垮了，地皮仍归国有。不过将来建筑房子要有规格，不能随便盖。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我们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要贯彻这个政策，是要真正作到劳资两利的。在执行初期不管发生多少偏差和错误，最后是一定要贯彻的。因为不这样，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大家要从根本上来了解这个政策，平日就

不至为一时的或个别的现象所迷惑。

有人很不愿意听“资本家”这个称号，很怕听“剥削”这个名字。这些名字倒不是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的名字来代替也可以，不过事实是如此。在没有找出另外的适当的名字之前，我只好仍旧叫你们“资本家”。资本家和工人是两个阶级。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这两个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个别问题的调和，或在某些问题上调和是可能的，根本解决，就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这是事实，不是谁可以制造的。不过我们把这个道理来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一下：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经过革命，你们看现在和国民党的斗争，就是严重地流血斗争，但是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私人资本是有他的积极性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的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那么你们要选那一条呢？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呢？如果有人说还有第三条路，如果说他能说服我们，也行。不过这个问题，在几百年前，在世界上象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大学问家终生就是在研究这个问题，我研究这一门，也有二三十年，如果说你们在办工厂方面是专家，那么我在这一方面，倒也是专家。我们认为非走社会主义的路不可。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要以为美国好的很，其实美国是苦的很，他们在闹生产过剩，在闹经济危机，要到国外去



抢人家的市场，国内外人民都在反对它。美国不得了！但你们这些资本家，还在年青时代，资产阶级在年青时代是有很大的积极性的，年轻时候不发财，总想发财，一旦发了财，就会觉得这个家很难当。生产过剩就要到外国去抢市场，就要打仗。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第二次也是这样打起来的，杀了几千万人，就是因为这个。这不是那个人愿不愿意打的问题，这是帝国主义这条路，使得他们一定要这样作。他们因为不得了，非打不行！好象国民党在和我们打仗中的命运一样，宋子文说：“和也是失败，打也是失败，与其和而失败，不如打，还有生存的可能”。总之失败是注定了的，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失败是已经成为前提了，于是就非打不可，所以他们苦的很！但我们就不然，我们好得很！今天解放了平津，明天又解放了南京上海，我们高兴得很！现在，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棐卿先生（东亚经理）谈过，我说：“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不一定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今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求得解决的，只能设法缓和一下。听说工人已经向

你们提出了许多要求，这就是在向你们斗争，你们很难过，于是来找政府解决，这是事实，我们得承认这些事实。有些工人的要求，是过高的了，如象要求增加工资一倍、二倍、到几好倍，使得资本家受不了，有些要求是不正当的，譬如要求分工厂分店舖；有些行动是不妥当的，譬如刚才有的先生所说的，工人不守厂规，不听指挥，不到时间就自己下了工等。这些事情，叫过分、过左，是部分的，不是全面的，有些事实，我们已设法纠正。这就是两个阶级在斗争，工人在斗你们，可是我要说明一点，就是这种斗争，是由两方面斗起来的，单是一方面是斗不起来的，而且一般的都是你们先斗。世界上向来就是如此，总是资产阶级先斗的，因为资产阶级先是处在优势，然后，工人就又反过来，斗资产阶级，最后总是推翻资产阶级。听说过去有些厂里，资本家打人骂人，还有强奸，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行为。今天解放了，工人有了共产党，神气十足，于是就有了过分的要求。

今天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我在工人代表会上，会号召工人要分清敌友，如果反对资本家，那就搞错了。要联合资本家使生产发展，除了联合以外，对资本家还须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只有联合没有斗争，是不合事实的。我不但鼓励工人这样作，而且也叫你们资本家向工人作“必要的适当的斗争。”因为斗争是自然的、客观的，两个对立的阶级，必须经过必要的斗争才能两利。政府拟定了一个劳资纠纷处理办法，等大家讨论后同意了，再作为正式法令颁布。但光靠那一个办法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

共产党不好。玩花头是不行的，譬如某工厂为工人要求五一节发衣服的事，想在工会、政府口中讨一句话拿来作资本、去挑拨工会、政府、共产党，这样做是不合道德，也不大合法的；反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倒是被允许的、合法的。此外在劳资斗争中不要去收买工人、工会、共产党员，不要故意拉这个打击那个，这结果会使工人对你们感想很不好。这样当然可能引起工人内部一时的不团结，但明天他们会搞到一起的。用这些办法最后弄得工人不信任你们。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尽管工厂有几千几百个股东，但你是代表股东，代表资方的，有义务有责任在工人身上剥削剩余价值，一块钱也是剥削。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是，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苦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工人剥削太多，而是太少了。工人、农民的痛苦在于没有人剥削他们，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说过：一百年中，资本主义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资本家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抹杀资本家的功劳。骂是骂，功劳还是有的。当然罪恶也有一点，但功大罪小。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展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愈多愈好，股息应该提高，如果工资过高，你们自己可以提出来。

李独尖先生提到合作工厂问题，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不准外股参加；二、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合作工厂。

雇请工人和辞退工人，你们有权，但必须是为了生产上的需要，如果是挟嫌借故，裁撤工人，只留下你的亲戚朋友，而他在生产中作用又不大，那就不允许，工人就要斗你。听说私营工厂也有官僚化，也应和公营工厂一样，需要整顿一下。工厂办得好，才能说服工人，才能站在有利的地位，与工人进行适当、必要的斗争。

工人起来了，话说得不好听是有的，于是你们便觉得面子上过不去，觉得“士可杀不可辱”，自然，工人不守厂规是不对的，我们已告诉他们要遵守，你们也可以按厂规处罚；同时你们又需要在劳资两利，尊重工人人格的原则下，修改一下旧厂规，交给工会和工人讨论，他们同意后，交政府批准；如果有的条文工人不同意，双方无法妥协，就是交政府，总工会加以判断。条文成立以后，双方都要遵守。

资本家和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工人对厂长职员轻视他们不满意。一般知识分子常看不起体力劳动者，认为自己有身份，工农没有身份。这和民主精神是不合的。“士可杀不可辱”是对敌人而言，但在中国人民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身份。知识分子常自高自大，耍架子，凭架子吓人。现在，你们应该放下架子，把工作服穿起来，和工人一样。职务可以有区别，人格却没有高低，除了在职权上可以指挥工人之外，其他问题上，你只能以朋友的关系去建议。美国厂里职员和工人的外表没有什么区别，这很好，这就是放下架子。高人一等的思想是贵族思想，封建思想，不是资本主义

思想。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就是人格平等。象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在汽车上，我就听汽车夫指挥”。又象北平大华窑业公司经理陈荫堂的表现，便都是尊重工人人格。这样做，可以使劳资关系更好一些，矛盾、斗争更少些。我们的军队里官与兵分不出来，大家共甘苦；我们在这里的上下干部之间为什么不闹事呢？也因为能共甘苦。

以前的社会风气，是有身份，有架子的人才能吃得开，这是社会罪恶。如果说剥削是罪恶，也怪不了那一个人。过去你们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一方面又剥削了别人，这是剥削社会的罪恶。我们现在要改的是社会制度，并不是对那一个人有仇恨；说放下架子也是一样。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互相尊重，各得其所。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安定，大家就好努力地进行建设工作。

## 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刘少奇

同志们：市委要我向同志们讲讲话。我和市委的同志们谈了一些问题。最近时期，我到几个地方跑了一下，跑的五个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同这五个省的同志都谈过，也找过一些工人代表、学生代表、民主人士谈过一下，当前的问题，毛主席作过报告的，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来谈谈这个问题。现在就我所感觉到的，以及同市委的同志们谈话中间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讲一讲。现在你们对这个问题正在讨论，讨论中有很多意见，有一部分意见的摘要我已看过了，对于某些意见，我可以谈一下。

### （一）

什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听说有很多同志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国内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国外的主要矛盾大家都清楚了，不要讲了。现在就是我们国家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想问题应该这样提法：到现在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在我国内是不是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现在恐怕不能这样讲了。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反革命也算是基本上消灭了，还剩

下一点残余，剩下一点尾巴，所以不能说现在在我国国内敌我矛盾还是主要的。也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些少数反革命分子要提高警惕，他还可以作乱的，还可以进行破坏活动。地主阶级的残余也还在农村里面，也有些人还是要作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中也有一小部分人还是不服气的。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性，丧失警惕性，麻痹警惕性是不对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但是他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那就是说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那就是说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矛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主要矛盾就转了，把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也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党的八次大会讲了这个问题，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这些矛盾都基本解决了，那么现在什么矛盾是主要的？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已经有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我看可以这么说。文章上面这样写了，现在国内主要矛盾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大量的表现或者集中的表现、主要的表现在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那么，自然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

这个问题就答复了。

那么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什么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我们说，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的说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某种条件之下，也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这里特别注意一个条件，在某种条件之下，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特别在处理不好的时候。如果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不好，处理错误了，本来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结果也变成为对抗。在一定的的时候，一定的地方，一定的条件之下，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发展成为对抗的。其他某些个别的情形也有对抗性的，如一个人打死了人，杀人犯之类，刑事犯罪，违法乱纪，这些情况，虽然在人民内部是个别的，然而也是不断的会有所发生的。这些矛盾你能说是不对抗的吗？那也很难讲。但这些是个别的情况。在一定的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之下，在个别的情况之下，有这种对抗性。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的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

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应该是什么方针呢？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那么处理的方针就不要以对抗的办法来处理，也是要用非对抗的办法处理。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就用什么方针、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个矛盾。既然是非对抗的矛盾，处理的方法、处理的方针就不能用对抗的方针，而应该采取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这样的方针，这不是处理对抗性矛盾的方针。处理对抗性的矛盾不能用这样的方针。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是处理非对抗性矛盾的方针。处理对抗性的矛盾不能用这个方针的。这个方针就是强调同



一性。矛盾有两方面，矛盾有两重性：有同一性，有斗争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它原来是有同一性的。强调同一性，而不是强调斗争性，只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斗争——中间不是有一个批评或者斗争嘛，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斗争——而这个斗争也是为了团结。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为了加强团结、巩固团结。所以处理方针是强调同一性，不是强调斗争性。如果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强调同一性，而是强调斗争性，使人民内部的矛盾没有必要地紧张起来，没有必要地激烈化起来，在人民内部造成紧张局势，那就是错误的，那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错了。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与处理敌我矛盾有不同的方针。处理敌我矛盾是强调斗争性，使矛盾紧张起来，使斗争激烈化，以致于把矛盾的对方压倒，消灭，这是处理敌我矛盾的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不是采取这样的方针呢？是不是也是使矛盾紧张起来，使它激烈化，压倒对方，甚而至于进一步把对方消灭呢？不能这样！很显然，如果采取那样的方针，那我们就犯错误，这就是基本方针上错误了，基本态度是错了。

在你们讨论中，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主要矛盾。那么什么是主要矛盾呢？有人说，今天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话对不对？我看这话也对，也可以这样讲。今天我们国内的矛盾，的确是无产阶级思想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但是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什么地方表现出来？照这个提意见的同志的想法，我估计大概是这样的：就是群众、工人、学生

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干部、我们领导者、我们厂长、我们校长、我们政府的负责人，是无产阶级思想。大概他们是这样想的。人民群众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而我们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思想，我估计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这样讲，我看就错了。

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首先就是我们党内的矛盾。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干部中间，或者说你们在座的那一个人的脑子中间，是不是有点非无产阶级思想？你们脑子里尽是无产阶级思想？一点非无产阶级思想都没有？有没有那么一点？你们那一个可以担保说我的脑子里面非无产阶级思想一点没有？你们在座各个同志的脑子里都有若干非无产阶级思想，有些人并且还不少。那么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首先在你们自己脑子里就矛盾起来了。在我们共产党内部也有这种情形。人民群众中间当然也有很多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在工人阶级、人民群众里面就一点没有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尽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恐怕也不能那样讲。我们党内有很多问题，主观主义是什么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教条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争名夺利是无产阶级思想？评级的時候升了两级，还睡了不起来，那是无产阶级思想？所以说如果讲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今天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是必须我们大家研究来加以解决的问题，那么首先要在共产党内部解决，而且要在共产党的干部中间先来解决，要把我们共产党干部中间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搞掉一点。

用什么办法搞掉？我们党内干部中间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用什么办法来跟它斗争，来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减少？用大民主的办法好不好？还是用小民主的办法？用解决敌我斗争的办法好不好？还是用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这个办法？那时候你们觉得用小民主的办法你们都受不起，为什么要对我批评，最好一点民主都没有。因此，我们觉得关于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问题，要这样分析，要这样看：现在在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命令主义、个人主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在我们党内、干部中间，是比以前搞得更多了，还是更多了一点，发展了一点？如果说更多了一点，那我们就有一个任务，就要把这个东西整少一点，总要越搞越少才好，越搞越少我们才会进步。

因此，就是讲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主要的，那么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首先就是共产党内部的矛盾，不是什么敌我矛盾。在今天我们中国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在帝国主义已经赶走、地主阶级已经消灭、资产阶级已经基本消灭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人民内部，而且也表现在共产党内部，表现在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中间。所以这个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不是也有阶级性？当然有阶级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农民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今天还有地主阶级思想。这些思想是反映过去的阶级的思想情况，不是、或者大部分不是反映今天的。今天的农民是新的农民了，今天的资本家也是新的资本家了，今天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跟农民是新的了，是

合作化了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了，今天的资本家也是公私合营了的新式资本家了。如果我们讲到非无产阶级思想，讲到农民阶级的思想，讲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地主阶级的思想，是讲过去的，是反映了那个阶级存在的时候。所以这里当然也有阶级的问题，但是这是反映在人民内部。

有人说，今天我们中国国内的情况，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如果说工人农民有矛盾的话，也应该说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工人阶级是人民，农民也是人民，工人与农民的矛盾难道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你说是敌我矛盾？而且今天的农民，刚才已经讲了，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已经在起变化而且基本上已经起了变化，他已经是合作化了的农民，已经是新式的农民。今天来讲农民阶级，这阶级三个字是值得考虑了，他已是集体化的农民了。所以工农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有人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刚才已经讲过，曾经有一个时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曾经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也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除开极少数的分子外，他已经不愿意反抗社会主义了，有很多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了。在这种情况下，矛盾就转化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曾经有对抗性的，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转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有人讲，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主要的、或者说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是主要的，因为这

是八大决议上讲的。如果有人这样讲，因这是八大决议上面讲了的，你说我不赞成，当然赞成。但这个矛盾是什么矛盾？是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的上层建筑是什么？上层建筑是谁？谁在代表上层建筑？今天的国家谁来代表？是不是在座同志们都代表一下子国家？那么你们就是上层建筑，你们就是代表国家，当然包括我、我们。我们、你们代表国家，共产党就代表国家。其它的上层建筑中间还包括思想、文学艺术、报纸这些东西。这些上层建筑就是今天的国家、政治、文化，这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你能说是敌我矛盾？代表上层建筑就是你们，就是我们，你说我们不算人民，算敌我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今天的生产关系是什么生产关系？所有制是什么所有制？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与分配关系。现在分配关系里面表现矛盾最多了，那么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是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是集体所有制内部的矛盾，这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先进与落后，这也是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总而言之，这些矛盾，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工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这些矛盾在过去曾经是表现为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过去是反动阶级代表落后，而革命阶级代表先进，是阶级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过去的上层建筑曾经是反动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曾经是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地主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上层建筑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买办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所以，上层建筑与

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曾经表现为敌我矛盾。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变了，国内形势有了根本变化，现在这些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现在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现在的先进与落后，表现在人民内部，不是表现在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间，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这是因为反动的统治阶级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这个情形变了，所以这些矛盾现在已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永远都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永远都有这个矛盾，到一万年以后还有。

还有人说，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或者说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大量表现或者集中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表现在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这样讲大体上是对的。那末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在座的同志们都是领导者，人民群众与你们的矛盾你说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是敌我矛盾，谁是敌人？是人民是敌人，还是你们是敌人？就发生这个问题。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群众与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可不可以这样讲，一般的讲来，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所谓基本上、所谓一般讲来，是除开了一种特殊情形，除开了特别恶劣的官僚主义、顽固的官僚主义、反人民的官僚主义、违法乱纪、大贪污犯等一小部分少数人以外，一般的犯了官僚主义错误，人民群众就不赞成他，就要反对他，这个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是不是算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是算敌我矛盾？恐怕要算人民内部矛盾才好吧！如果不算人民内部矛盾，那么我们要受不起，在座的同志，恐怕你们也受不起吧？还是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才好，这样你们才好办，不然，就不好办。恐怕这种官僚主义，我们做领导者在目前情况之下，多多少少总要犯那么一点，完全没有官僚主义，恐怕这个事情是很为难的。我就有不少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这个东西，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之下，几乎是很难完全避免的，领导机关、领导者，稍稍要犯一些的。每一个人，我们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都值得检讨一下，检查一下，倒底自己有多少官僚主义？说“我没有官僚主义”的那种人，你不要相信他，恐怕这种人官僚主义还更多。当然恶劣的、顽固的，与人民群众完全对立起来的官僚主义还是少数。但是在某些情况比较严重的、已经引起人民反对的这种官僚主义，现在已经不少，不是很少，而是相当多，在各个方面都有。

另外还有同志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矛盾是什么矛盾？是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如果讲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讲思想问题，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呢？从思想上讲是对抗性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对抗性的，是不可调和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可不可以调和呢？我看是不可调和的，两个主义的体系是不能调和的。唯心与唯物是不能调和的，一个是真理，一个是非真理，是谬误。真理与谬误，是与非中间的矛盾是不是对抗的？我看是对抗性的。因此我们说要辨明是非，要把是非辨明白，是是还是非，要辨明白；不是说把是非调和起来，不是说调和是非，而是说辨明是非。所

以是非不能混淆起来，而是要把它分得清清楚楚，不是混淆是非，不是调和是非，是辨明是非。要寻找真理，把谬误去掉。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谬误，是与非，这些从思想上讲是不可调和的，这个矛盾是對抗性的。

但是唯心与唯物曾经表现在敌我阶级之间，敌对阶级之间；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谬误、是与非，曾经表现在敌我之间，敌对阶级之间。在以前，帝国主义是唯心，革命者是唯物；真理是革命者的，谬误是帝国主义，是蒋介石，是地主阶级，或者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发国难财的，发横财的。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蒋介石他们是非，而革命者方面、人民是是。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谬误，是与非，曾经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所以这种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谬误、是与非之间的矛盾，它的对抗，表现在阶级之间的对抗，表现在敌我之间的对抗。而今天，帝国主义已经被赶走了，蒋介石被打倒了，地主阶级已经消灭了，资产阶级问题也解决了，那么是不是还有唯心与唯物、还有真理与谬误、还有是与非？还有。那么表现在什么人中间？它表现在人民内部，不是表现在敌我之间，不是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人民内部有唯心主义跟唯物主义两种思想，人民内部有些人是真理，有些人是谬误的，人民内部有是有非。所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情况变了，这些问题不表现在敌我阶级之间了，而表现在人民内部了。因此，这些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思想上来讲是對抗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当着这些矛盾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的时候，我们采取对抗的办法，采取打倒的办法，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来解决唯心与唯物问题，解决真理与谬误问题，解决



是非问题。你看我们只说帝国主义就是非，不说帝国主义还有什么好处，还有什么，我们只说蒋介石是王八蛋。当着唯心主义表现在敌我阶级之间的时侯，譬如胡适，我们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我们对蒋介石是一棍子打死，对帝国主义是一棍子打死，对胡适也是一棍子打死。当着这些问题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的时侯，我们解决办法是采取对抗的办法，打倒的办法，一棍子打死的方法。而当着今天唯心与唯物、真理与谬误、是与非的问题表现在人民内部，那我们解决的办法是采取什么？要采取和风细雨、小民主、小小民主，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方法。是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如果不是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采取粗暴的态度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犯过这个错误。在教条主义统治的时候，对于我们党内的斗争也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现在我们是不是还要采取这种办法？现在我们大家总是有点不服气，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不大服气，总想要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这表现了很多同志们的心情。我看提出这些问题，他们的心理焦急了，来反对党现在所提出的这个方针，不赞成这个方针，要和党来比。那么我就问你，唯心主义在你们脑子里有没有？特别是提出这些问题的同志们，他脑子里有没有？他就是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他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一点谬误也没有？他的就是是，一点非也没有？如果说在我们党内同志们还有主观主义的话，而主观主义是什么东西呢？主观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嘛？恐怕提问题的人教条主义更多。教条主义是什么？教条主义就是唯心主义。提这些问题的人，他

的脑子里有不少的唯心主义，不少的非真理，不少的谬误。我问你，那一棍子打死好不好？在你们脑子里有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也是对抗的，不可调和的，那就一棍子打死好不好？你们有教条主义的时候我们就一棍子打死，你们有经验主义的时候也一棍子打死。那你们就不赞成了。打别人可以，打自己就不赞成了。因此，要推己及人。当着你自己脑子里有唯心主义的时候，你不愿意人家采取粗暴态度来对待你，那么当着别人脑子里有唯心主义的时候，你也不要采取粗暴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推己及人嘛！我看这样比较好。如果采取粗暴的态度来解决思想问题，那就是很不好的。我们曾经有过经验，打来打去，打的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一棍子打死办法，结果我打死你，你打死我，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们过去也有过经验的。

所以，在目前什么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可以答复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刚才提出这样多问题，我已经讲过了，这些问题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这些问题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主要的，而我还要讲。

这里有一个问题，矛盾有对抗性的矛盾，有非对抗性的矛盾。矛盾是一切，一切都有矛盾。世界就有矛盾，全部世界，整个世界，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一切都有矛盾。但是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基本上带对抗性的矛盾，另一类是基本上不带对抗性的矛盾，所以要分两类，矛盾有这两类，这是客观存在。客观上存在这两类矛盾，一类是带对抗性的，一类是非对抗性的。因此，处理矛盾的方法，也有两种方法。处理带对抗性的矛盾是一种方法，而处理非对抗性

的矛盾又是另外一种方法。如果我们把对抗性的矛盾当作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那是错误的。本来一个矛盾是对抗性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非对抗性的，因此我们处理也是当作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那我们就要犯错误。比如修正主义就是这样。修正主义强调劳资合作。本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欧洲那些国家，在西方国家是对抗性的矛盾，而社会民主党人说西欧那些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非对抗性的，主张劳资合作，主张经过改良、把资本主义改良一下就可以变为社会主义，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那就是说，他把对抗性的矛盾看成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处理又是不强调阶级斗争，而强调阶级妥协，强调用妥协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来消灭资本主义。所以他们犯了错误，基本上犯了路线错误。这是一个例子，这种例子还多得很。把对抗性的矛盾当作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把非对抗性的矛盾当作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也是错误的。本来这个矛盾不是带对抗性的，但是我们把它看作有对抗性，看作是对抗性的矛盾，而处理它的时候又采用那种处理对抗性的矛盾的办法来处理，那我们也就要犯错误。比如托洛茨基主义，曾经说工农矛盾是对抗性的，托洛斯基曾经主张压榨农民来建设社会主义。本来工农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他把它看成是对抗性的，而处理的方法用处理对抗性的矛盾的方法来办。我们有些同志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把人民群众当敌人。本来是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应该采用非对抗性的办法来处理，但是他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采取一种压制的办法，当作对抗性矛盾来处理，这就基本上犯错误。比如我们党内对犯

错误的人采取一棍子打死办法，本来，一般讲来，党内的矛盾除开如陈独秀、托洛茨基派、张国焘之外，一般的党内意见不同、主张不同，那是党内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辩论中间，不允许对别人采取一棍子打死办法。如果把非对抗性的矛盾当作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这就犯错误。

因此，首先是认识矛盾，把矛盾认识清楚，要具体研究，具体审察，具体分析，对于问题来了，看这种问题，这种现象，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确定它是对抗性的矛盾，处理方法就不同；确定它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处理办法又不同。认识矛盾，而后决定处理的方法、处理的方针。对矛盾认识不清楚，矛盾的性质确定错了，那末处理方针也要犯错误；处理方针错了，那就一系列要错，一系列的具体办法要犯错误。我们说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一般讲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是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当然，事情是复杂的，这两类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的，对抗性矛盾会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矛盾转化了，处理的方针也要随之转化。比如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在我们党内犯机会主义错误的人，曾经在一个时期是非对抗性的，后来可以转化为对抗性。比如陈独秀主义，陈独秀主义老早就存在的，在党内曾经是非对抗性的，可以同他辩论的，可以允许在党内解决。果然我们党内曾经有很多同志犯过陈独秀主义错误，后来转化了，后来改正了，但是有那么一部分人犯了陈独秀主义错误死硬不改，坚决不改，坚

持并且在党里面进行分裂活动，组织另外的派别，组织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在那一个时候，进行分裂活动，组织一种特殊的派别。在党内，那个时期陈独秀机会主义就变为对抗性了，变为对抗性矛盾了。王明路线，是党内的一個机会主义路线，我们批评了这个路线，改正了这个路线，但是还没有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一直到現在，虽然王明同志还没有承认错误，到第八次大会，他还没有承认错误，但是他还没有搞分裂活动，也没有反党、跑到敌人那里去，所以这个矛盾，还是没有变为对抗性的，还是党内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立三路线，是党内的非对抗性矛盾。刚才讲了，就思想上讲，就是非问题来讲是對抗性的，但是他表现在党内，表现在无产阶级的内部，党的内部。李立三不是敌对阶级的代表，不是表现在敌对阶级之间，而是表现在无产阶级内部。张国焘曾经是非对抗性的，后来跑到敌人那里去了，那还不是对抗？还有一个高岗，但高岗不同。上面谈的派别是用一种纲领来争取同情，来取得党的领导权，而高岗则是进行阴谋活动，是另外一种性质，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他改正错误，不进行阴谋活动了，那还可以转化。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是讲党内。人民内部一样，人民内部问题，例子可以举得很多，就是说，在一种特殊条件之下，两类矛盾可以互相转化，原来对抗性的，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例如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原来根本上是带对抗性的矛盾，因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但是后来，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它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了，它可以和平改造了。其他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也是这样。

## 第十一讲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林彪右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 毛主席语录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转引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转引自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人

民日报》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转引自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人民日报》

**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转引自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

**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转引自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

**从思想上、理论上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

转引自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转引自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人民日报》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转引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日  
《人民日报》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转引自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人  
民日报》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  
第四期

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  
第三期

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  
第七期



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转引自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

“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

转引自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

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  
第三期

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

转引自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转引自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转引自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人民日报》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

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转引自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人

民日报》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

参考文件：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周 恩 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

### 关于九大路线

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

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志们记得，毛主席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开幕的时候，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在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毛主席并且预言：“**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九月八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

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亿万各族人民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林彪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事实证明，林彪反党集团不过是一小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极为孤立，无碍大局。林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也不可能挡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奔腾前进，反而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九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成果。被林彪破坏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得到发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加强战备、参加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方面作出了新贡献。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现在已经是由二千八百万党员组成的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人民战胜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

新胜利。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财政贸易情况良好。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技术事业，也有许多新成就。

在国际方面，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九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友谊，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孤立中国的政策宣告破产，中美关系有所改进，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推动着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因此，在这里就不需要多讲。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



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另一个头子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更露骨地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三月十日《真理报》）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说的“思想胜利”就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道路”就是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

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

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付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五卷380页）

同志们！

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

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垮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问题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

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蔽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我们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更加发展，我们党更加壮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只要我们全党牢记历史经验，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 关于形势和任务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

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正是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

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国际事物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坚持二百里领海和

经济区的斗争，都在继续前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的斗争，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宣布欧洲年，召开欧安会，表明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

“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这是它们制造的各种假象掩盖不住的。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国家所识破，受到第三世界的强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不满。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今年六月美苏会谈及其以后的形势，更加证明这一点。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美苏两霸的野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想吞掉中国，咬不动；对欧洲、日本，也咬不动，更不要说广大的第三世界了。美帝国主义从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下坡

路，它公开承认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从越南撤退。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  
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  
治、经济、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专家被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  
亚非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一系列的事实，深刻地暴露出它  
新沙皇的丑恶面目，它“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的反动本质。它做的坏事、丑事越多，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  
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来得越快。

最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中苏关系问题讲了许多废话。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等等。这些话，是说给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听的，妄图挑拨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掩盖新沙皇的真面目。更主要地是说给垄断资本家听的，希望仗着反华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赏钱。这是希特勒的老把戏，只是勃列日涅夫表演得更加拙劣罢了。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  
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领土，难道要中国把长城以北统统让给苏修，才算表示我们赞成缓和世界局势，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吗？中国人民是骗不了、吓不倒的。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的一贯原则。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人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属于前一种；列宁的叛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只要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认清方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有可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硬要发动战争，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的革命，加速它们的灭亡。

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十分重要。因此，在国际，我们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国内，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

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台湾省是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对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有光明的前途。台湾一定要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同志们！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总是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很繁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某些不正之风，还有待努力克服。我们全党要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各项工作做好。

首先，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广大群众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

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力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希望，经过持久的努力，“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继续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组织要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关心群众生

活，做好调查研究，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要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要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使那里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其他劳动群众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各级党委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领导水平。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警惕这种倾向，认真地改变这种作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创造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经验，为我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这项百年大计经常列入议程。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要经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因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能上能下，经得起儿上几下的考验。不论新老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到党和人民需要的任何岗位上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同志们！党的十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将有深远的影响。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

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全党一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不辜负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选自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

## 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社论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他在见不得人的阴暗的角落里，在他的死党中间，甚至在公开场合，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并且题在壁上，记在日记上，当作“座右铭”。

为什么他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

孔孟提出了“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说什么“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林彪在九大以后多次鼓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孔孟鼓吹“生而知之”。说什么“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林彪把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狂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实行独裁统治。

孔孟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污蔑劳动人民只会说“恭喜发财”，只能想“油盐酱醋柴”。

孔孟宣扬“德”、“仁义”、“忠恕”。林彪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孔孟鼓吹“中庸之道”。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孔孟鼓吹“以屈求伸”的处世哲学。林彪说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随机应变信如神”，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使用的是反

革命两面派的手段。

孔孟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林彪攻击“五·七”道路，污蔑下部下放劳动“等于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破坏毛主席制定的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

孔孟之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林彪教子尊孔读经，还把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武王传授的统治经验，作为“教子经”抄录给他的儿子，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凡此种种，都证明批孔确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是为了更好地批林。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搞武的要学文，搞经济基础的要懂得上层建筑。要害问题是批不批。要批，就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知难而进。

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带头批林批孔。要发动群众，把孔孟的反动论点同林彪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加以对照，逐条地批。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



新生事物。要通过批林批孔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深入基层,进行试点,训练骨干,抓好典型。要经常研究批林批孔斗争的新动向,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广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主力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最敢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批林批孔最内行。“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人一样的。”这话说得多好啊!工农兵用生动的语言,一语击中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要害。工农兵起来了,批林批孔才能批深批透。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一些受孔孟之道毒害较深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进行自我教育,工农兵对他们的进步是欢迎的。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们要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迎着风浪前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选自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

## “林氏春秋”的破产

——评林彪一伙炮制的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

军政大学大批判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效法孔老二修订《春秋》的故伎，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炮制了一部反动史书——《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以下简称《斗争史》）。它全面地篡改党的历史，狂热地吹捧林彪，实质上是一部为林彪树碑立传的“林氏春秋”。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九七〇年春，林彪抛出反党的政治纲领，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就在这个时候，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党中央，采取阴谋手段，进行了炮制《斗争史》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叫嚷：“写党史要写林彪”，要把林彪“放在领袖地位中去讲”，通过党的历史看林彪的“伟大”。他们把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边的林彪打扮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把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林彪吹捧为“无产阶级军

事家”，企图证明“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林彪的头上，直接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制造历史根据。《斗争史》出笼后，林彪大为赞赏，它成了林彪的死党们歪曲历史、吹捧林彪的蓝本，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大小“舰队”进行反革命教育的基本材料，成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展政治攻势”的重要舆论工具。

彻底批判林彪一伙炮制《斗争史》，歪曲和篡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反革命罪行，深入揭露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本来面目，是我们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林批孔运动的一项战斗任务。

—

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共产党人〉发刊词》）《斗争史》正是在武装斗争这个根本问题上伪造历史，一开头就把林彪吹捧为我军的“创建者”和“英明指挥”，为林彪制造了个“一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的起点”。它一笔抹煞南昌起义诸领导人，别有用心地换上一个林彪，胡说林彪“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和毛主席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到了井冈山以后，林彪“最忠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来“坚持不懈”地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在长征中，又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颠倒。

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

第一枪。众所周知，南昌起义是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诸同志领导的，井冈山会师是朱德、陈毅等同志带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和湘南农军到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合。林彪既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也不是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领导人，更不是“率领”部队“奔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领导人。林彪的这一段历史很不光彩，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当时担任七十三团二营七连连长的林彪，对革命悲观动摇，开了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只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重新归队。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是高举“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还是搞流寇主义，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林彪在陈独秀取消主义的影响下，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林彪多次说井冈山根据地不能维持，散布悲观思想。一九二九年五月，在红四军前委瑞金会议上，林彪从右倾观点出发，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时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反对毛主席关于建立闽赣浙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后来写了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在这封信里，毛主席批评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指出林彪“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篇长信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党中央照顾林彪的要求，没有点他的名，并作了删节。但林彪对毛主席的批评，一直心怀不满。到了一九六九年九月，他在《重上井冈山》的反动词

中，更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批评，说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要翻历史的案。《斗争史》不仅掩盖了林彪在井冈山时期的错误，而且吹捧林彪“最忠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志壮坚信马列”的谎言一唱一和。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经历了国民党的五次反革命“围剿”。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一九三二年一月，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要“夺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用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

林彪不仅没有“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而且紧跟王明，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向军委建议：中央红军“斜出湘境”，“解决何健，占领湖南中心城市”，“并进而夺取重要城市”。一九三二年八月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了毛主席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林彪根本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斗争史》却捏造说他在会上“顶天立地，不怕压制，当即严正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毛泽东’”。《斗争史》的炮制者竟然把林彪说成是发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天才”，拚命地往林彪的脸上贴金，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毛主席被排挤出中央苏区领导以后，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第四次反“围剿”还是取得了胜利。《斗争史》把这次胜利归功于林彪的“英明指挥”。试问林彪当时只是一个局部的指挥员，而且早就倒向王明路线了，怎能指挥

整个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地方武装胜利地进行第四次反“围剿”呢？林彪一伙如此吹嘘，就是要为把林彪打扮成解放军的“直接指挥”者，在党的历史上伏下一笔。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谓“正规战争”的作战原则被强制推行于中央红军，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六路分兵”、“短促突击”、“堡垒战”、“消耗战”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贯彻到部队中去，而林彪正是这一套“新原则”的狂热鼓吹者和积极推行者。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和四月三日，林彪向军委建议“构筑坚固的新式堡垒”，派兵“死守”。四月底，反“围剿”的形势对我非常不利，红军广大指战员对王明路线日益怀疑和不满。五月四日，林彪又写信给军委，说什么“我们对堡垒如运用得当，那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六月十七日，林彪在《战争与革命》第四期上抛出了《论短促突击》的黑文章，公开为王明机会主义军事路线辩护，攻击毛主席的诱敌深入的方针。他胡说：“要知道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办法了”。他大肆吹嘘“短促突击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够取得战役上的胜利”。他还拚凑了实行“短促突击”的二十六条具体措施，为王明路线出谋献策。王明、林彪一类骗子，对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根本不懂，一错再错。毛主席指出：“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林彪在会上，态度暧昧，不同王明路线斗争，实际上是继续站在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斗争史》胡诌什么林彪“在遵义会议上，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捍卫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又是凭空捏造。毛主席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是在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决不是人为地树立起来的。《斗争史》的炮制者把毛主席领袖地位的确立，说成是林彪“捍卫”的结果，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无耻背叛，是对我党历史的恶毒歪曲。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直接领导中央军委工作，亲自指挥了我军历史上有名的四渡赤水河的伟大战役。林彪在这个战役中，对抗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继续推行王明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一九三五年一月底，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汇合，北上抗日。由于几十万敌军摆下了大包围圈，毛主席英明果断地决定暂不渡江，在川滇黔地区寻求新的机动，命令林彪率领一军团向扎西（威信）集中。林彪不服从命令，不仅表示他“不宜向南走到扎西集中”，而且要军委向北靠近他集中。军委在六天中发了八次命令，林彪在敌情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拖延四天之久，才把部队开向扎西。毛主席看到贵州敌人空虚，突然挥师东进，再渡赤水河，指挥红军抓住有利战机，坚决歼灭当面之敌，再次解放遵义。林彪右倾畏敌，提出和毛主席相反的意见，说什么部队无法迂回到娄山关以南包围敌人，而且又是仰攻，不易攻克。他徘徊途中，畏缩不前。毛主席严厉督促，林彪

才带领部队向遵义前进。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红军在娄山关、遵义地区歼灭敌人二十个团，打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尔后，毛主席又指挥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河，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巧渡金沙江，把几十万敌军远远甩在后面。在节节胜利的进军途中，林彪与彭德怀勾结，诬蔑毛主席“指挥的不行”，“拖垮了部队”。林彪还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他又写信给中央，要求撤毛主席的职。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评林彪，粉碎了他们夺权的阴谋。《斗争史》所谓林彪“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执行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完全是无稽之谈。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张国焘反对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提出向川、康、藏少数民族地区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进行阴谋活动，分裂党、分裂红军。在这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林彪想投靠张国焘。他无耻吹捧张国焘路线是“正确”的，说什么如果张国焘“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有几个人哪！”张国焘对林彪也很赏识，成立伪中央时，把林彪列为伪中央委员和伪军委委员。这一铁的事实，戳穿了《斗争史》编造的林彪“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的谎言。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提出要发展和巩固陕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高潮。这时，林彪由于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心怀不满，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个月內，八次写信、发电报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表示要离开陕北革命根据地，到陕南去“打游



击”，想搞一个独立王国，同中央相对抗。他在一封信中说：“我如继续在一方面军中工作，对工作上没有丝毫的好处，我坚决不干，也决不当勉强我干。”他还直接致电毛主席，表示“宁可忍受处分”也不留在陕北。林彪这些公开反抗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所作所为，对《斗争史》吹捧的所谓“一贯紧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 二

八年抗战中，林彪有一半时间过的是休养生活，只有半年是在前线。可是《斗争史》却抓住他在抗战时期的短暂经历，大做颠倒历史的文章，把林彪打扮成能文能武的抗战功臣。他们胡说林彪“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亡国论’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抗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培养了大批干部”；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精辟地阐明了我党的群众路线，有力地驳斥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谬论”。历史事实是这样的吗？根本不是。

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为我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一九三七年八月在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投降主义倾向，特别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即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我党我军都不能成为国民党的附庸，最要紧的是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这时的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

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提出在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打运动战的错误战略方针；这就正中蒋介石的限共、溶共、灭共的阴谋计划。林彪站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一边，反对洛川会议的精神，反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到了华北前线，拒不执行毛主席要他将部队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广泛发动群众，创造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示，而要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大仗；他鼓吹我军“不应以做群众工作为中心任务”，叫嚷“目前……为我军进行运动战之良好机会”。直到一九三八年春，在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分会召开的临汾会议上，林彪还继续贩卖王明的“以运动战为主”的错误战略方针。毛主席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到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战略转变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就包括同林彪的严重争论在内。林彪是紧跟王明，而不是“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毛主席亲手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并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还亲自到抗大讲课。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抗大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我党我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斗争史》的炮制者抓住林彪一度兼任抗大校长一事，为他大捞政治资本。其实，林彪在抗大工作时间不长，而错误很多。他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所作的《抗大的教育方针》的报告中，公然鼓吹“我们在政治上的中心内容就是统一战线”，抗大的教学“应该采取更加适合于统一战线的方法来教”，反对讲授马列主义，反对进行阶级教育。这和王明提

出的“抗大是统一战线的学校，不是某党某派的私有学校”是一个调子。王明和林彪对抗大性质的歪曲，是十足的投降叛卖行为。一九三九年七月，毛主席在《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这是对王明和林彪在抗大推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严肃批判。

《斗争史》所鼓吹的关于林彪“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亡国论’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也是根本没有的事。林彪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只有歌颂，没有批判。一九三八年十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林彪到了一九四〇年七月，还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的反党文章，以大量的篇幅颂扬国民党军队的所谓“赫赫战果”，要“国家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周围”，要“一切中国军队服从统一的司令部”，这实际上就是要把共产党“统一”到蒋介石的“中央政府”里面去，把八路军、新四军“统一”到蒋介石的“统帅部”里去。一九四二年一月，林彪从苏联回国，途经兰州时，和国民党官员打得火热，不分彼此，成为当时报界要闻。他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还受宠若惊地说：“此地长官，对我逾格优待，感情极为融洽。对国事意见，均极感诚恳一致，殊堪告慰。”看！林彪推行王明的阶级投降主义的右倾路线，已经达到何等地步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确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

的指导方针。毛主席在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毛主席的讲话言犹在耳，林彪就跳出来大唱反调。他在大会发言中，以讲群众路线为名，贩卖“上智下愚”的孔孟之道，恶毒诬蔑劳动人民。他胡说什么：“老百姓天天不是在谈抗日，在谈共产党这一套。”“他们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这是林彪唯心史观的大暴露。他在这次发言中，还胡说什么：“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就是不注意‘产’，忘了本。共产党员不注意‘产’，那就大大不合格。……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我们的终极目的是共产主义，就是干这样的事。”林彪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讲注意“产”字，只讲“大家发财”，否定科学的共产主义，贩卖资本主义。《斗争史》的炮制者把这样一篇充满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黑货的讲话，吹捧为“精辟地驳斥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谬论”，把政治骗子林彪装扮成“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 三

在解放战争时期，《斗争史》把林彪吹捧为解放全中国的“常胜将军”。它胡说什么林彪“坚决抵制”了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

“创造性地运用”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早已剥下了林彪的“常胜将军”这张画皮。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主席根据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号召全党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刘少奇则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取消人民军队，把革命胜利的果实送给蒋介石，以适应蒋介石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的需要。在这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中，林彪站在刘少奇一边。他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指示部队时，就曾明确地说：“东北和平已成确定前途”。针对林彪的这种和平幻想，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指示林彪，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可是林彪置若罔闻，六月十六日在《东北日报》上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叫嚷什么“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七月七日，他又伙同彭真搞了一个《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提出“使东北与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他们还提出“要准备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声言要使军队“国军化”，准备把人民军队拱手交给国民党反动派。林彪明明是竭力推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急先锋，《斗争史》却把他吹捧为反对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的“英雄”！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保卫解放区，发展人民力量，毛主席确定采取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而林彪从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不敢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

五年十月下旬，蒋军开始进犯东北。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林彪：为了争取时间，以便展开全东北的工作，必须坚守山海关，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并且立即以锦州为中心地区，集中主力，布置内线作战，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相机歼敌。在我军兵力居于优势的情况下，林彪以部队“疲惫、涣散”，“不惯吃高粱米”等理由，消极避战，以致敌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占我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地。在四平战役中，毛主席指示林彪，要象邯郸战役那样，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而当敌主力分路向四平集中时，林彪却把我军主力摆在四平及其西北之喇嘛甸一线，进行正面防御，形成敌攻我守的被动挨打态势。战役中期，敌人疲惫待援，林彪又把我军主力部署在东起北丰，西至八面城约六十公里的战线上，分兵把口，消极防御。后来敌人集中主力，突破了我军四平以东的防线。这时，林彪这个被《斗争史》吹得神乎其神的“常胜将军”，惊慌失措，擅自下令撤出四平，自己抢先逃往哈尔滨，使部队失去了指挥。

一九四八年秋，毛主席根据全国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紧紧地抓住了有利战机，英明地决定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林彪畏敌如虎，不敢进行战略决战，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反对毛主席将战略决战首先指向东北战场之敌的英明决策。在辽沈战役中，他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东北主力南下北宁线的战略部署，对抗毛主席关于全力打锦州的作战方针，违抗毛主席关于迅速抢占营口、断敌退路的重要指示。由于毛主席的亲自领导、组织和指挥，排除了林彪的干扰和破坏，辽沈战役取得了歼敌四十七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

的辉煌胜利。

在平津战役中，林彪在政治上右倾，在战略上短见，在指挥上擅权。他一再拖延入关时间，不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擅自命令一些部队不走热河而走山海关，公然违抗毛主席关于荫蔽我军战略意图的指示。他在整个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尚未完成之前，错误地主张先打南口，对抗毛主席制定的对平津之敌首先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方针。毛主席当即指出，打南口在全盘计划上是不妥的，有迫使北平之敌早日逃至天津、塘沽的危险。这时林彪仍然无视战略全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坚决要打南口，并且擅自命令两个军全力向南口前进。毛主席急电制止。由于毛主席正确的战略决策和直接指挥，使东北和华北两个野战军按照既定部署，完成了对平津之敌的分割包围，并取得了歼灭和改编五十二万国民党军的伟大胜利。

第四野战军主力渡江南下后，迅速地歼灭白崇禧部，是解放中南地区的关键。在和白匪作战过程中，林彪一再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多次贻误战机。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毛主席指示林彪，应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七月，又连续指示林彪，要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使其最后不得和我作战。林彪无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一再被白崇禧迷惑，不敢大胆穿插迂回。十月初，四野主力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向两广进军。林彪以为白匪要在衡阳、宝庆（邵阳）地区与我决战，一面下令北路军停止前进，收缩兵力；一面擅自改变毛主席要十三兵团直下柳州的部署，下令该兵团东进宝庆、祁阳地区，参加衡宝战役。白匪却利用我大军收缩的机会，向东安、

桂林逃窜。幸亏我军一个师插到了衡宝公路以南，在后方牵制了敌人，才使四野主力在追击中歼敌两万余人。衡宝战役的胜利，绝不象林彪死党鼓吹的那样是林彪“英明指挥”的，而是有的部队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占领了白崇禧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造成的。

对于海南岛战役，林彪更是缺乏信心。他无视蒋介石反动集团已经土崩瓦解的总形势，不相信广大军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多次打电报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夸大渡海作战的困难，要求无限期推迟海南岛的解放。参加渡海作战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解放海南岛的作战部署，于一九五〇年四月解放了海南岛。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尖锐的斗争。林彪参加过的一些战役的胜利，正是毛主席英明指挥的结果，是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战胜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才取得的。《斗争史》编造了林彪“渡黄河，过长江，越五岭，跨海峡”，“从长白山打到五指山，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的神话，是经不起历史验证的。

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并且轰炸我东北地区，用武力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毛主席、党中央毅然决定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这时，林彪从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出发，和刘少奇站在一边，极力反对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林彪叫喊什么：“我们的国家刚刚初定，国内还有些残余的土匪没有肃清，这个时候要顾内，又要顾外，对我们是不利的。”这是



林彪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铁证。

《斗争史》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党的历史也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和篡改，本文不一一批驳。

孔老二及其门徒修《春秋》，开创了反动的褒贬笔法的恶劣先例，《斗争史》的炮制者沿袭了这一套反动的手法。他们“打着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以宣传毛主席为名，虚提一笔毛主席是制定路线的，然后大肆渲染林彪“宣传、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所谓“功勋”，大树特树林彪。他们奉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骗子哲学，随心所欲地说假话，异想天开地造谣言，把林彪的一贯右倾写成“一贯正确”，把他的顽固对抗写成“伟大贡献”。历史事实有力地戳穿了林彪一伙的无耻谎言。林彪根本不是什么“一贯紧跟”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总是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林彪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军事家”，他在我军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关键时刻，总是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历史的结论。

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林彪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早年投机革命，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对于他的历次错误，毛主席、党中央多次给予批评教育。林彪不仅顽固地坚持错误路线，而且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他地位越高，野心越

大，最后发展到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

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就英明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林彪及其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没有也不可能逃脱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宣告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彻底破产。随着林彪的葬身沙丘，“林氏春秋”也遭到可耻的破产，成了一部短命的反动史书。

“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现在，历史已经把林彪和“林氏春秋”推上审判台。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将通过深入批林批孔进一步戳穿这个伪造历史、制造反革命舆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解放军报》